

十九世紀中國國際觀念之演變

王 爾 敏

一、緒 言

近五十年來言及中國近代史者，莫不自中國對外態度為出發點。既在探討中國對外態度，一般意旨所趨，莫不就中國固有對外態度為檢覈對象。近三十年內之研討醞釀，綜合而成一種固定結論，歸宿於中國之天朝意象與中國中心觀念。或專言「中國中心」或專言「天朝意象」，大要不外批斥此種觀念所反映之妄自尊大，深閉固拒，固步自封，不明外情。殆已形成中國傳統對外關係一種固定之形容與印象。立言者非一，一概視為最合理之解釋。¹

思考現時近代史家所津津樂道，演論其一種學說，實覺尚須深加探討，蓋知此說風靡當世，殆成定論，若不細加研究，再深進一層發掘，恐此不甚完全之解釋，將必導致更多誤解，據此論說而產生更多演繹。

就歷史發展，尋繹中國政治傳統，何以形成中國中心與天朝意象等觀念，進一步加以澄清，實較說明現象更具意義。近人論著，頗評議中國中心與天朝意象對於近代中外關係之影響。設就中國中心與天朝意象之現象作進一層反問：一、中國何以產生此類觀念？二、何時形成此類觀念？三、此類觀念在國際間行用之意義如何？四、中國近代之轉變如何？自為對此問題之充分研討。本文之撰著，以現時問題疑難啓發動機，並就學術上近代史學解釋之責任，不得不急於提出討論，尚望能引起學界之注意。

中國中心觀念，其形勢創始於共主時代，其理論可以尚書禹貢為代表。是所謂五服制度，即環王城所在方圓五百里稱為甸服。環甸服向外延伸，四方各五百里稱為侯服。環侯服向外延伸，四方各五百里稱為綏服。環綏服向外延伸，四方各五百里稱為要服。環要服向外延伸，四方各五百里稱為荒服。² 即令謂禹貢成書在春秋時代，亦可信其所本，實即當時宗周政治統治形勢，作一理想整齊之解說。

事實上在秦帝國統一中國之前，所有中國範圍內外，同時存在許多列邦，夏商兩代自不待言，即自西周以至春秋戰國而言，實是列國紛立局面。而在宗周封建一統之下，各國同時有其實質上之繁密交際關係，彼此交通往來，早已形成一定國際關係之習慣與制度。此種長期維持國際關係之制度，就實際需要上言，比天朝中心觀念更要有實效而

1 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著，國雄譯《中國的世界秩序》，《明報月刊》，二卷五期，一九六七年五月號。第七至十二頁。

又劉紀曜撰：《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朝野的天朝意象及其衍生的觀念態度與行動》（一八三九——一八四二）《歷史學報》第四期，台北，國立師範大學，民國六十五年刊。

2 曾運乾著：《尚書正讀》台北宏業書局，民國62年印，第八十三——八四頁。

意義重大。³

秦漢統一之後，形成中國一體與四方各民族交際來往形勢。抑且儒家經典各立官學，《尚書》尤為儒學通用教材。《禹貢》五服之中國中心理論，遂亦自然成為普通常識；政治家應用，亦不免據為參考。四方諸國，雖漫稱之為夷狄之邦，而交際未嘗中斷，彼此國際關係，漸至形成上下區別。中國皇帝，自秦漢已帝天自命，天朝意象，亦必自然生成。至於形成嚴密制度，足供充分參考者，則在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之中國中心形勢及天朝意象觀念，表現於體制完密之封貢關係。東西南北沿邊民族，與中國交往，無不列在藩封。簡約言之，封貢制度實為中國中心觀念之具體化與制度化。而實質上則關係複雜，體系完密。若干學者檢討批評，不免太過淺薄籠統，充分顯露無知與誇大。

中國封貢制度以至其中重大行為之宗藩貿易，皆因歷史發展而成。其間重要意義，值得學者反覆思考討論。近年作嚴肅研究並有重大成就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存武所著之《清韓宗藩貿易》，當可為學界提供一種完備深刻而正確之認識。⁴

明清兩代封貢制度，維持沿邊和平交際達五百年之久，邊外各國皆然，而以中韓、中越關係最具代表性。封與貢所表達之政治性關係，一般俱為象徵性。彼此來往表現於文化禮制儀節，蓋授封印、頒正朔、納表、朝賀、進貢，純為一種繁縟之儀禮形式。其實在極端扼要之經濟依存關係則於此種重大儀節之外頻繁進行。貢使之來，一入邊關即由驛館接待，凡貢單正名之隨員，一概進駐驛館，並一路循驛站供應驛馬腳夫，全由中國國家負擔用費，直迄其離境返國。而隨來之大批商人，則俱集聚邊關通市，以有易無，直至貢使返回。使團隨行者，除貢品外尚携大量貨品，因為到京朝貢，賞賜之外，尚可在會同館開市八十日，與北京商貿交易，期滿離京。因其來往行程甚費時日，合計邊關互市可達四五個月之久。此即中國與沿邊發展而成之特殊貿易形式，相沿已久，商人趨之若鶩，非封貢制度本體，然因執行封貢而產生，足見此種制度有適應實際需要之彈性。

明代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及二十五年（一五九七）日本大軍進攻朝鮮，中國兩度遣兵援救，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因豐臣秀吉之死，日軍始行敗退。而中國亦撤兵回華，絲毫不貪朝鮮土地財貨之利。朝鮮君民因此設大報壇以為紀念。此在西方學者不明淵源究竟，反作鄙惡之曲解，以厚誣中國，真是無知。中國屢屢用兵平朝鮮、越南之亂，實本宗主國之道義，毫不貪其土地，實淵源於一種古老思想，且深受此一思想所支配。余十數年前嘗言之，命為「存祀主義」，其實質史例，為周武王克商之後，竟不滅商反封之於宋，並存夏禹之後封於杞，存舜之後封於陳。而上古史乘若《春秋》三傳以

3 雷海宗撰：《古代中國的外交》，《社會科學》，三卷一期，民國三十年四月刊。第一至十二頁。

4 張存武著《清韓宗藩貿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一九七八年印。

及《國語》、《史記》並再三倡議「興滅國、繼絕世」，「起絕祀、舉廢廟」以為上古王政之要典。後世秉此觀念而入於封貢宗藩制度之中。蓋出兵救援朝鮮，純為救其危亡，乃存祀主義有以使之。茲當西方殖民主義橫行之世，何能為人了解？焉能不斥其為至愚至陋？傳為笑柄。中國在外交上對此一觀念最後之應用，實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日本於光緒五年吞併琉球，改其國為沖繩縣。次年經其外務卿井上馨設計，通知中國，建議將琉球羣島劃分為二，南半屬中國，北半屬日本。而清廷對策，則要劃分三段，南屬中國，北屬日本，其中段則留為琉球國王宗社所守。雖然李鴻章願意接受日本辦法，並已商妥分割協議，而清廷朝議爭持不決，終使此案虛懸。中日間迄無任何妥協，至今已達百年之久。以西方殖民主義強權外交觀點評論此事，必至騰笑百世而無由猜度其顛末。

中國最後一次執行宗主國封立屬邦嗣君之舉，係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原來中國西境中亞之屬國，已在十九世紀中葉大半為英俄兩國吞併。中國素稱回部藩屬，昔時之浩罕、布魯特、哈薩克、布哈拉，均已落入帝俄之手。此外英人吞併阿富汗之後，鄰近之中國藩屬若巴達克山、魯善什克、南瓦罕諸小部，以及中國西南境之克什米爾，俱隨之為英人吞併。光緒十八年初，英軍又攻伐乾竺特（又名坎巨提），其部衆逃奔中國邊境求援，總理衙門電告駐英公使薛福成向英交涉，英國政府向薛氏聲明，決無併滅乾竺特之意，亦不反對中國宗主權，並不阻止其朝貢中國，但願與中國聯合主持，為乾竺特選立新君。英方意在原會長之弟，遂於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五日）由中英兩國派員會同封立乾竺特新君。此一行動，一則杜絕英人之吞併乾竺特，二則保持中國宗主國地位。⁵

中國最後一次執行藩屬入貢，是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由英國代緬甸向中國朝

5 薛福成著《出使公牘》（光緒二十四年刊）卷一，第二九頁：『本大臣於正月十六日，在巴黎承准貴衙門，（總理衙門）咸電，當即馳赴倫敦，與英首相兼外部大臣侯爵沙力斯伯里會晤數次，往復辯論，英廷扭於琉球、越南、緬甸之舊樣，以為業被吞併，中國即不能過問。又揣中國向不務勤遠畧，謂我平時未嘗管理坎巨提事，非若英之久筭坎政，籌貼歲費，所以深閉固拒，不願我與聞坎事，堅韌異常。本大臣就彼兩屬之說，與之力爭，兼用旁敲側擊之法，隱示形格勢禁之謀。磋商匝月，始稍就緒。議於舊酋之兄弟子姪中選立一人。由新疆巡撫或喀什噶爾道，就近派員赴坎，會立新酋，然彼猶以坎巨提立酋，中國向不派員，苦相詰難。本大臣答以坎酋繼立，是否由喀什噶爾就近派員，一時無從查考，此次事屬非常，必須由中國派員，以表兩屬之證據。將來尋常繼位，不妨查照向章，向若派員則仍派員。向不派員，亦不因此次而援為成例等語。外部始願遵議辦理。』

又薛福成著《出使奏疏》（光緒二十年刊）卷上，第五五頁：『臣惟數十年來，西洋諸國日肆東封。俄闢琿春，英守香港，其初皆係中國之地，彼族知我中國疆土廣遠，向不計較尺寸，尤不力爭藩屬，乘閒抵隙，競生無髮之謀。於是日本滅琉球，法人取越南，英人翦緬甸。相率效尤，竟無底止，甚至有覬我朝鮮睨我台灣者，亦事勢使然也。英人之經營坎巨提，殆非一日。此次乘霧而動，彼謂叢爾部落，中國必度外置之。迨臣承總理衙門指示，斷斷與爭，稍出英人意料之外。彼既以立酋為轉圜，我即可藉保小為退步。雖選酋之柄隱屬於英，然既稍稍爭體制，俾各國知兩屬。小部中國尚不肯舍棄，已稍變琉球、越、緬之前規。似於大局不無裨益。且俄、法諸大邦，見中、英交誼如是親睦，亦當稍戢其囂陵之氣矣。』

貢。此一問題，最具現代國際政治參考性。可惜中外人士對此史例早已忘懷，茲大叙畧說於此。原自光緒十年、十一年間，中、法為越南問題開戰，中國窮於應付之際，英國乘機吞併緬甸。中國毫未阻止，使英國得以順利擴張廣大領土。當時駐英公使曾紀澤與英國議界，此時英人猶在外交上擴地至緬甸境外以北各土司，得寸進尺之餘，英人允許緬甸保持對中國朝貢之制，而曾氏要求由中國封立緬甸嗣君，則被英拒絕。中英雙方於光緒十二年六月在北京定約，並訂十年朝貢之制度，列為約文中第一條。按十年一貢，當在光緒二十年入貢。及至英國統治緬甸穩固，將約文等閒視之，不欲履行。時薛福成任駐英公使，堅請英國實踐條約，英國推避不過，終於答允派緬甸最高之大員，準備貢品，到期向中國朝貢。此一史例值得多方深思，其中一點，足以破強權外交家之遁辭。當光緒十二年，英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為安然取得緬甸全部領土，竟願與中國訂立十年朝貢條約，遷就中國之封貢體制。近代史家不知對此作何領悟與解釋，但請答案任由各人自定。總之，值得深思研討。⁶

二、西方衝擊下對外適應之轉變

中國對外態度，其固有傳統之基本信仰，最為注重誠信。思想淵源，本之於儒家學說，抑且出於孔子之言，是所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論語，衛靈公》）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外互市開始，早期主持外交領袖若伊里布、耆英、黃恩彤、徐繼畲無不採取誠信態度，反而西方外交家，欺愚中國無知，乘機攫取條約權利，隨時擴張特權，形成無底慾壑。此中外關係永難達致公平之關鍵，西方列強野心難戢，應負全部責任。

近世中國領袖之和平誠信主張，蓋始終支配歷來理性之官紳。前述諸人之後，若曾國藩、李鴻章、王韜、郭嵩燾、鄒誠、陳熾並據儒家對外之誠信觀點，引為當代應取之態度。直迄十九世紀末年。⁷ 倡以誠信對待外人之言，可謂史不絕書。一般言論大要，如何桂清所謂：

臣維馭夷之法，從古以來，並無善策。當兵精餉足之時，鞭撻四夷，如使左右手。一遇中土多故，即乘間而起，無不深受其害。今各該夷尚假信義以通商，故

⁶ 薛福成著《出使奏疏》卷下，第十七頁：『查緬約第一條內，英國允由緬甸最大之大臣，每屆十年，派員呈進方物，所派之人應選緬甸國人等語。當英兵據緬之初，使臣曾紀澤送准總理衙門密電，以立君存祀商之英國外部，英廷不允存祀，始改為存貢之議。迨英署使歐格訥與總理衙門訂立緬約，儘力磋磨，意存翻悔。經總理衙門堅持不懈，始將十年派員之例列入約中。誠以告朔餼羊，雖不過稍存禮意，而百年舊典，未可弁髦棄之也。』

⁷ 王爾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台北，一九六九，第一八六至一八八頁。

又，王爾敏著《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一九七七，第六十四頁。

臣欲示之以信，順其性而馴之，使之就我範圍。⁸

王韜舉孔子所言，以論當代對外態度：

宣尼不嘗言曰：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西人之至我中國，亦惟推誠布公，必信必速，毋區畛域，毋許膜視，盡我之懷柔，竭我之胞與，以示一統之盛而已。⁹

郭嵩燾舉歷代史例以為對外信義明徵：

嘗論中國之控御夷狄：太上以德，周武王成王是也，後世無能行之。其次以畧，漢唐之事是也。其次以威，漢武帝於匈奴，唐太宗於突厥諸國是也。其次以恩，漢之於西域，唐之於回紇、吐番；北宋之於契丹是也。而信與義貫乎四者之中而不能外。¹⁰

徐承祖就當時外交情勢而提出誠信原則：

與洋人辦理交涉事件，宜言信行果，無詐無虞。於其求請之事，如彼此有益，固宜允行。或於彼有益於我無損，亦可允之。倘獨益於彼而損於我，自宜力卻，切不可設詞推托，延緩時日，反令伊藉為口實，多方挾制，以遂其有請必准之謀。倘於不能允從之事，仍然再三瀆請，始終據理直卻，即別國聞之，亦以我君主之國，例應如此。倘一二事能如此決斷辦成，則彼知我國辦事有百折不回之定見，其狡猾不馴之氣，誅求無厭之心，自然消矣。¹¹

薛福成盛稱孔子所論，為中外相處永世不磨之至理名言：

抑余又在外洋，閱歷二年，深有味於《論語》子張問行一章：忠信篤敬，蠻貊可行。實為顛撲不破之道。嗚呼！聖人之言，何其神也。¹²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皮錫瑞在南學會講演，引用孔子兩處話語，奉為對外態度之圭臬。實可見中國官紳持信之恆久，申說之諄諄：

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是聖人待夷狄蠻貊，亦必用恭敬忠信。若少見多

8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同治六年成書，民國十九年起故宮博物院景印），卷三十一，第二十三至二十六頁。

9 王韜著《弢園文錄外編》（光緒二十三年，上海，弢園老民刊），卷十，第十一頁。

又，同前書，卷二，第二五頁：『要之，使臣固當熟諳和約，詳稔公法，審時度勢，察機觀變。以忠信篤敬上結主知。』

10 郭嵩燾著《養知書屋文集》（光緒十八年刊），卷九，第十頁。

11 《洋務運動》（上海，一九六一年），第一冊，第二四七至二四八頁。

12 薛福成著《出使日記續刻》（光緒二十四年刊），卷三，第六三頁。

怪，忽觀異言異服，即加欺侮，甚至毆辱。與聖人之言恭敬忠信大背，豈義理文明之國所為？¹³

孔子發抒國際誠信交往意旨，至少當為西周至春秋時代列國維持和平以及交聘禮儀之基本精神。歸納列國間歷久通行之交際習慣，提鍊而成一種思想觀念結晶。施之現代，實足以為萬國立國共同宗旨。試檢十九世紀以來之列強並峙局面，曾有何國真正重視誠信，今日之世界，乃一國際陰謀之競技場，大國率先領導，此中國之所以為俎上肉也。

中國初始與西方列國交際，不知西方外交，通常以夷務洋務視之，雖然限於知識不足，不免自我蒙蔽，而主持者大體尚具通識，決不至如一般人之茫昧。曾國藩以儒家理學自持，而基本觀點，深具理性。如其對於西洋傳教主張開放，即有一定見地。國藩《致吳竹莊（坤修）函》：

鄙意辦理洋務，小事不妨放鬆，大事之必不可從者，乃可出死力與之苦爭。當康熙全盛之時，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國，自京師至外省名城，幾於無處無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時，則傳教一事，猶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過於糾纏，正欲留全力以爭持大事耳。¹⁴

郭嵩燾談及西國，推崇備至，盛稱為三代之治，見之於與王闓運會談，王氏日記載於光緒六年二月二日：

與佐卿過筠仙（郭嵩燾），盛談夷務。筠仙言政事好立法度，望人遵守，以夷國能行其法為不可及。且以為英吉利有程、朱之意，能追三代之治，鋪陳久之。余以為，法可行於物，而不可行於人，人者萬物之靈，其巧敝百出。中國以之一治一亂，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氣則詐偽興矣。使臣以目見而面諛之，殊非事實。¹⁵

「外交」一詞應用於國際關係討論之中，最早出現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薛福成之《籌洋芻議》。此一命義，一直沿用迄今。代表國際間全面之交際交涉活動：

彼西人之始至中國也，中國未諳外交之道，因應不盡合宜。彼疑中國之猜防之蔑視之也，又知中國之可以勢迫也，於是動輒要求，予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應，繩之以約而不盡遵。今中國雖漸知情偽，而彼尚狃於故智，輒思伺中

13 《湘報類纂》（光緒二十八年，上海，中華編譯印書館印），第十二頁。

14 曾國藩著《曾文正公書札》（光緒二年，傳忠書局刊），三十一卷第十一頁。

又《捻軍史料叢刊》（一九五七年印）第三輯，八十九頁，《曾國藩致吳竹如（廷棟）函》：「目下中外之患，洋務最巨，其次則中原之捻，其次則甘肅、新疆之回。」

15 王闓運著《湘綺樓日記》（民國十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第九冊，第八頁。

國有事以圖利也。¹⁶

薛氏同時亦將交際交涉作清楚區別，公私分明，以便於外交因應：

西人以交際與交涉判為兩途，中國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禮貌隆洽，及談公事，常截然不稍通融。中國之於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讓以虛而不讓以實也。¹⁷

當時西方列強，恃強蔑理，惟務擴張，外交人員，盛氣凌人。於中外交涉中乃為常見。中國雖重誠信，而外交接觸，迭受要脅，豈能毫無感悟。自咸豐末年外使駐京，外交關係已成日常要政，中國朝野遂亦普遍產生警覺。王韜論交涉對策，已提出西國使節之矯強逾分，貪得無厭；主張公布報章，用輿論制裁：

今西國使臣之在中國也，動恃一己之見，輒肆欺凌。彼國朝廷多未之知也。夫中西之所以隔閡者，原以語言文字之不同耳。每歲西人在中國所行之事，其有關於中外交涉而或未循乎約章顯悖乎和誼者，不妨備刊日報，俾其國人見之。庶知選事生釁者咎不在華人，而實在西人也。此所謂達內事於外也。使臣行轅，宜設譯官數員，彙觀各處日報，而韻取要畧，譯以華文，寄呈總理衙門。則泰西邇日之情形，正如犀燃燭照，無所遁形。即遇交涉之事，胸中自具成竹，此所謂通外情於內也。¹⁸

薛福成亦詳為分析列強在華外交人員之強梗欺妄：

西洋各國駐華公使領事，無不任意挾制，遇事生風。余以為洋人性情剛躁，不講禮義之故。及至歐洲，與各國外部交接，始知其應付各事，頗有一定準繩。周旋之間，彬彬有禮，亦尚能顧交誼，不肯顯露恃強陵人之意。亦不顯露矜智尚術之意。非特英、法也，各國皆然；非特外部也，各員皆然。即如前駐京英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我中國人皆以為妄人也，暴人也。而威妥瑪與余交，情文並摯，隨時襄助，且其學問議論，即在中國，亦斷不能以常人視之。然苟再至中國，不能保其不為患也。且洋人之恣挾制於中國也，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始於道光年間之和戰無定，屢戰屢敗，既為洋人所輕。繼以咸豐季年，為城下之盟，定喫虧之條約，益為洋人所輕。厥後雖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堂司各官，

16 薛福成著《籌洋芻議》(光緒二十三年，上海，醉六堂印)，第十七頁。

又，薛福成著《出使奏疏》卷上，第四至十五頁，光緒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奏：「大抵外交之道，與內治息息相通。如商稅受損，則財用不足矣。教民橫恣，則吏治不飭矣。海外之華民保護不及，則國勢不張矣。內地之土貨行銷不遠，則民生不厚矣。此在任使事者設法維持，隨宜籌措，雖舊約驟難更改，而情勢或可變通。臣擬於茲數者，審度情形，俟有機會，大則奏請諭旨遵辦，小者函咨總理衙門裁酌，總期捷聲息而通隔閡，收權利而銷外侮。」

17 薛福成著《籌洋芻議》，第八十至十九頁。

18 王韜著《設園文錄外編》，卷二，第二四——二五頁。

皆未洞識洋情，因應不能得訣。每遇一事，大抵御之以多疑，蒙之以寡斷，二者適與洋俗相反。震至格格不能相入，其剛者爭非所爭，柔者又讓非所讓，而事益不可為。且偶有一二洋使性情稍慤，不甚施挾制之術者，非特要事無一可商，且有以微事而受嚴拒者。彼見夫善挾制者之多得所欲也，於是相承而趨於挾制之一途，即慤者亦漸化為黠，懦者亦漸變為悍矣。此風釀之者非一日，即改之者亦非一時。¹⁹

薛氏並分析各國在華使節形成貪婪狂妄之積因：

大約彼國外部尙能遇事主持公道，不如駐華使臣一味自逞私意，強人所難。如從前威妥瑪、巴夏里(Harry S. Parkes)之徒，動輒要挾，實皆以此為見長之地，非盡出英廷本意。論者咸謂：外部筦數十國交涉之事，統籌大局，故其心寬平。駐華公使，所筦祇一國之事，其心迫隘，皆欲多占利益，取悅於其本國商民。況從前中國未知外洋情形，所予外人利益，每以勉強得之。因而習以為常。²⁰

邵作舟析論當日此類情勢，歸於中國不明外情所至，而建議推廣譯書，增強對外認識。

方今之勢，泰西微弱不足數之國，舉得乘他人戰勝之威，嚴氣厲色以加乎中國者。此非真有所恃也，我之名久屈於外，而於彼之時勢窳要又有所不能盡知。是誠不免於心懾氣餒，廢然而自沮耳。豈彼一城之長，一旅之衆，舉皆在於不可敵之數哉？誠大譯諸國史乘，地志、氏族、職官、禮樂、學校、律令、事例、賦稅程式、一切人情風俗、典章制度與夫倫常教化義理之書，官為刊集，徧布海內。則天下之有志於時務者，不必通其文字語言，而皆可以讀其書，究其事。朝得而學之，夕可起而行之。內則擇其善政，斟酌損益以補我之所未備；外則洞知其強弱治亂，向背喜惡，有所盟約論議，則以知其張弛操縱，而恫喝之術窮，知其異同得失而舉措之機當。以中國人才之衆，不及十年，雖寸兵尺鐵，其所以應敵折衝於樽俎間，必超然有以異於今日。²¹

馬建忠倡說知己知彼，外交因應，須明西國朝野政情，輿論大勢：

今也開新報之禁而清議愈多；重議院之權而民情可達。輪舟火道之星羅棋布，往來便而俗尚則計日而更。水汽機力之雷動風行，工商裕而財源則與時遞長。所以辦交涉者，非若昔時惟窺探一二人之心思，可以坐操勝算。又必洞悉他國民情之好惡，俗尚之從違，與夫地利之饒瘠。始足以立和議、設商約、定稅則，而不為

19 薛福成著《出使日記續刻》，卷四，第七三至七四頁。

20 薛福成著《出使公牘》，卷三，第九頁。

21 《洋務運動》，第一冊，五七一頁，《邵氏危言》。

人所愚弄。故視昔爲倍難焉。余嘗讀鬼谷子書，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人之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哀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入其彀中者，豈有異術哉！兵法曰：「知己知彼。」交涉之道盡於是矣。夫彼不易知也，故閱彼新報以揣其要旨，入彼議院以察其變遷。上結紳矜，默觀動靜，下連商賈，隱相機宜。²²

汪康年尤痛切探討，歷指中國所受西方列強之賤削凌辱：

始西人至中國，猶震其夙名，以爲聲名天物之所在也。已而察其政，則其紀綱弛紊而不理；過其野，見其阡陌零亂而不整；行其途，見其道路污穢而不潔。遇其貴人，則情勢憤然。遇其士民，則事理昏然。於是彼以爲可肆意相待者莫是若矣。是以凡要挾誅求，不能以待他國者獨能以待中國。凡偏苛之令，不能待他國之民者獨能以待中國之民。於是有藉一案而求償金數倍者。因一事而請改約章者。華人殺西人，則官革犯誅；西人而若此，則百不治一。華人負西人債，誅索不止其身；西人而如是，則一聽其官之所擬。甚至愆期失約，同一事而治之不同。蓋彼見我官之輕其民也，固謂我民之可以輕矣。見我兵之擾民也，固以我民爲不妨擾矣。見士民之侮其官長也，固以官長爲可侮矣。見我民之互相擠排互相爭奪也，固知我民無相顧惜之心矣。故雖西人之教素尚公平而卒至若是者，蓋以爲待中國人則應如是也。²³

中外交涉，最關緊要最佔分量之項目，卽爲一國之利權。中國漸次覺悟，深惜往日所喪失甚大，而今後列強苛求無厭，隨時必爲利權發生更多爭執，因是視爲急切問題。早期談論者爲李鴻章、王韜、吳汝綸等，爲近代利權思想先驅。吳汝綸意旨在於民生國本天然之利：

閱應道（寶時）議改和約各冊及通商衙門議開六條。相侯（指曾國藩）謂：凡關小民生計者，皆宜與之力爭。此極有見。惟開挖煤鐵一條，相侯從應道之議，以爲借外國開挖之器，與中國永遠之利。可准試辦。吾謂洋人請開挖煤鐵，此其志欲擅我自然之利。一准開挖，則利權歸彼，我復何所利也。²⁴

王韜尤其注意外人所得非分之權，王氏稱爲「額外權利」，實卽今日所稱之治外法權，爲影响最大之外交特權。

向者英使阿利國（Rutherford Alcock）以入內地貿易爲請，總理衙門亦以去額外權利爲請，其事遂不果行。夫額外權利不行於歐洲，而獨行於土耳其、日本與我中

22 建忠達《適可齋記言》（光緒二十二年木刻本），卷二，第十二至十三頁。

23 汪康年著《時務報論說彙錄》（民國二十七年，杭州），第六頁。

24 吳汝綸著《桐城吳先生日記》（民國十七年蓮池社印），卷六，第三頁。

國。如是則販售中土之西商，以至傳道之士，旅處之官，苟或藉事，我國悉無權治之。此我國官民在所必爭，乃發自忠君愛國之忱，而激而出之者也。故通商內地則可不爭，而額外權利則必屢爭而不一爭，此所謂爭其所當爭也，公也，直也。²⁵

王氏尤其強調此中主權意味，實為主權思想之先驅：

今我朝廷，已准英使所請增埠各口。蓋以見中國並無自域之心，而深具柔遠睦鄰之意。彼於增埠之後，而請減釐金，蓋欲以加惠於商人。中朝亦不能不許，我朝廷於是亦酌加稅項，因時制宜。以示一朝之規制。蓋加稅一款，乃我國家自有之權。或加或減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強與我爭也。于是宜與者與之，宜取者取之。此中具有權衡。我朝之從容駕馭不遠出於尋常萬萬哉。夫我中國不能以有益者盡與英人，猶英人不能以有益者悉畀我中朝也。去取之間，蓋在當軸者明其公私曲直而已。²⁶

國際之間，列強並峙，天下紛爭，惟噬弱者。俄、普、奧之瓜分波蘭，固其先例，而列強在華，亦無不相協而謀，惟以損華利權為其外交宗旨。中國處此國際形勢，早已發覺陷於眈眈環視之列強包圍中。王韜早將此見告之於丁日昌：

蓋諸國通商中土，榮辱休戚，無不相同。猝有變故，無不相衛。雖彼此之間，或有隱懷嫉忌，而其外未嘗不陽為協和。其內歐洲而外中國，由來已久。固非中國之所能左右之也。昔人有言以彝攻彝，以彝間彝，以彝制彝，其策未嘗不善。而斷不能行之於今。苟欲以是施於中土，未有不鑿柄者。何則，今昔之時不同，而中外之地殊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之謂也。²⁷

宗育仁就中國自身，檢討招致西方聯合共侮之情勢：

外國之併力以圖中國，固由於彼教之尚同。而我國之獨異，亦有一名一實有以招之。實者，中國之地產富饒，棄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華夷之界限，中國擁其尊名，而事或廢弛，民多流徙，宜為外域所不服。《春秋》最嚴夷夏，而自來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漢以後夷禍相尋，至於今日。經言夷夏之辨，以禮義為限，不以地界而分。傳言降於夷則夷之，進乎中國則中國之。倘如舊說分以地域，則降於夷者必徙而之夷，既無是事。進乎中國者，必進而据地，進而据地，滅人之國，方討之不暇，反視同中國，又無是理。且杞降為夷，未聞遷

25 王韜著《弢園文錄外編》，卷三，第二五頁。

26 同前書。

27 王韜著《弢園尺牘》（光緒二年印），卷八，第七至八頁。

地，狄入城周，不聞進之。執此以談。不通明矣。又公會戎於唐，傳虜晉獻戎執凡伯於楚邱。實乃衛人貶絕之義，於此可見。又若楚之先為帝師，初見《春秋》乃稱荆。吳為泰伯之亂，初見《春秋》，僅稱人。其後俱進而稱子，許以為霸。論其初，則族類未改，論其後則國地未遷，而進退迥殊，夷夏相反。明是因其政教不由禮義，則謂之降於夷；政教改從禮義，則謂之進乎中國。明乎此理，則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義一以貫之。法國議和條約一款云：以後凡中國自行一切公牘，自不得以夷相稱，約雖施行，而其意終疑忌。此即各國與中國隔閡之情，可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爭名之習，人情大同。但彼知夷為賤稱，而不知所以賤，中國知夏為大稱，而不知所以大。徒擁虛名，以招攻射，其幾甚微，妨於經訓不明，而貽害至於中外交亂。今於修訂公法書中講明此理，俾知聖人之書，一無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爭。聽命於道，自察於己。既釋猜嫌，漸慕名教，既慕名教，則中國實為名教宗國，未有不推服欽崇。²⁸

萬國林立之世界，國際關係繁密，據交涉往來維繫其間，往往積累而成習慣，紬繹而成原則制度，是即國際公法之所由出。而所謂國際公法者，據西方列國教義史例與習慣以為基礎。東方國家任何已有條目，毫不足備為參考。西方制度因西方強國之殖民擴張而推向世界各地。是以歐洲之國際公法，即自然而成全世界之國際公法，因西方列強之承認而共遵循之。自咸豐十年十二月（一八六一）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應各國之駐使，以及彼此展開交際交涉，不免漸從西方外交體制，萬國公法遂亦成為不可少之外交參考。同治三年美國教士丁韋良(William A. P. Martin)譯成《萬國公法》，總理衙門予以刊印，並發南、北洋大臣各港埠應用，實質上即已充分採行西方公法觀念。國人廣泛注意，並作討論批評。薛福成深知公法之實效，建議廣為刊布，發地方州縣應用：

西人風氣，最重條約，至於事關軍國，尤當以萬國公法一書為憑。如有阻撓公事，違例干請者，地方官不妨據約駁斥。果能堅韌不移，不特遏彼狡謀，彼且從而敬慕之。如或詭隨駭法，不特長彼驕氣，彼且從而非笑之。蓋西洋立國，非信不行，非約不濟，其俗固如此也。方今海疆州縣，商船之絡繹，傳教之紛繁，事事與洋人交涉。乃當其任者，往往以未見條約，茫茫然不知所措，剛柔兩失其宜。其偏於剛者，既以違約而滋事端；其偏於柔者，亦以忘約而失體統。啓釁召侮，職此之由。似宜將萬國公法，通商條約等書，多為刊印，由各省藩司頒發州縣，將來流布漸廣，庶有志之士，與辦事之官幕書吏，咸得隨時披覽，一臨事變，可以觸類旁通，援引不窮矣。²⁹

28 宋育仁著《采風記》（光緒廿一年印），卷五，第三至四。

29 薛福成著《庸庵文編》（光緒二十三年，上海，醉六堂印），卷一，第二十六頁。

福成對於當時強國之蔑視公法，欺侮華人，尤痛切言之：

西方輒謂中國為公法外之國，公法內應享之權利，闕然無與。如各國商埠獨不許中國設領事官，而彼之領事在中國者，統轄商民，權與守土官相埒。洋人殺害華民，無一按律治罪者。近者美國驅禁華民，幾不齒中國於友邦。此皆與公法大相刺謬者也。公法外所受之害，中國無不受之。蓋西人明知我不能舉公法以與之爭，即欲與爭，諸國皆漠視之，不肯發一公論也。則其悍然冒不韙以陵我者，雖違理傷誼有所不卹矣。³⁰

當日國際現勢，強凌弱，大欺小，歐洲文明之邦，無所顧忌，雖有公法，何能制之。鄭觀應亦明確評析其無效：

雖然公法一書，久共遵守，乃仍有不可盡守者。蓋國之強弱相等，則藉公法相維持。若太強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太強者如古之羅馬，近之拿破崙第一，雖有成有敗，而當其盛時，力足以囊括宇宙，震懾羣雄，橫肆鯨吞，顯違公法，誰敢執其咎。太弱者如今之琉球、印度、越南、緬甸，千年舊國，一旦見滅於強鄰。諸大國抱不平，誰肯以局外代援公法致啓兵端。不特是也，法為德蹶，俄人遽改黑海之盟，法無如之何也。土被俄殘，柏林不改瓜分之約，各國無如之何也。然則公法固可恃而不可恃者也。³¹

王佐才（浙江定海人）並具相同見解：

我觀泰西今日之局，小國援公法，未必能卻強鄰，大國藉公法，轉足以挾制小國。則所謂萬國公法者，不過為大侵小強陵弱藉手之資而已。豈真有公是公非之議論哉？試取歐洲之近事徵之，為公法不足憑之一據。夫法被德蹶，俄人遂背黑海之盟，英法固無如之何也；土被俄殘，柏林不改瓜分之約，各國亦無如之何也。此在歐國，猶專以勢言，矧為亞細亞與亞美利加兩國交涉之事乎。³²

歐洲列強，背信而貪利，恃強而侵畧，公法何能戢其野心。涂儒魯謂為弱肉強食之世。近代形容列強擴張，此語最為切貼，並出現最早：

30 薛福成著《庸庵海外文編》（光緒二十三年，上海，醉六堂印），卷三，第一五——一六頁。又，同前書，第十五頁：泰西有萬國公法一書，所以齊大小強弱不齊之國而使有可守之準繩。各國所以能息兵革者，此書不為無功，然所以用公法之柄，仍隱隱強以弱為衡。頗有名實之不同。強盛之國，事事欲軼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繩之，雖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於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國，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雖能自奮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損於公法之外者已無窮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損益大有不同者其實也。雖然，各國之大小強弱，萬有不齊，究賴此公法以齊之。則可以弭有形之釁，雖至弱小之國，亦得藉公法以自存。」

31 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正續編》（光緒十九年刊），卷四，第九頁。

32 《格致書院課藝》（光緒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上海復園校刊），己丑卷上，第六頁。

公法之興，其戰國之遺術乎。泰西以商立國，四出通商，不能有均利無偏害，利害分則爭，爭則怨，於是海上兵衅開焉，爲法以弭之，號於衆曰：吾公也。孰則非之，然而弱肉強食，其終至於背信而趨利，烏乎公？³³

宋育仁窮本溯源，評介公法之本旨：

虎哥(Hugo Grotius)原書，名《平戰條規》。主於抑強扶弱。推本於良知，謂出於上帝之禁令。此西士之學最醇正者。惟其無禁戰息爭之權，故不免依違其說，謂各國治法，以利國爲尚；諸國同議，以公好爲趨。此乃萬國之公法，與人心之性法有別。後來諸家或推本一源，或截然分性法、公法爲二事，而皆失其本旨，遂流爲法律之學，所謂銖銖而稱，寸寸而度。³⁴

宋氏申論歸趨，以爲中國不能遵而自縛。蓋西方列國同教，尙未盡進於十誡，何能持此公法以爲共守之律：

今各國交涉雖不盡遵從，然不敢顯然不顧。由於歐洲皆同教之國，公法皆敷教之言，創公法諸家本意，不過望同教諸國不相侵害，不敢望異教諸國奉爲指歸。然彼教推行益廣，賴國之兵力相輔而行。教皇失權，無力自制歐洲大國，歐洲大國反持此柄以制異教各邦。土耳其、印度等國爲所脅服，且其本教亦與同源。遵公法，猶有可言。至中國與之交涉，亦援引支節兩歧理義不精之公法，束身歸獄，是誠不揣本而齊末矣。但既與交馳，自當同稟公律，以爲議事之制。彼教之流雖異，其源不甚相遠。至於是非曲直，人心大同。特彼方所聞無有進於摩西十訓者，故竭其人之心思，不能折衷一是。³⁵

宋氏並主張用中國之《春秋》，演爲今世之公法。現代學者，或將非議，中智以下亦可逆料。推原其故，實卽世界現勢以西方列強爲主。然其精神基礎，必可補今世國際關係之缺憾。精密之處，尤足啓示國際和平交留意義。作爲外交教材靡有不可。此固美國教士丁韋良立意研究中國古代國際公法之意。宋氏申論，足堪參考：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實萬國之公法，卽萬世之公法。如會盟、朝聘、侵伐、平亂、行成、存亡、繼絕國等，使臣爵等，會盟班次，無事不備，無義不精。此類皆西書公法所斤斤聚訟，訖無定論者。《春秋》三傳，各有義例，合之乃成完備。如自治境內，義在《穀梁》。交際禮儀，例在《左傳》。駕馭進退，權在《公羊》。修明此經，以爲公法。是至當不易。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

33 《沅湘通藝錄》（清光緒十三年，長沙刊），卷三，第五五頁。

34 宋育仁著《采風記》，卷五，第五頁。

35 同前書，第二至三頁。

外夷狄，須先自治，始能治人。如以為迂遠，則宜取彼公法之書為之駁正。一稟《春秋》之律，判其疑義，斥其違反，譯而行之。彼國公師，既明其理，必相附和，教勢積重，人情所嚮，即彼武臣富商，交持國政，亦不能奪也。聖教陰行，而外患自免，遇有交涉，亦不難為，非迂談也。³⁶

近代西方維持國際關係，公法之外，厥為彼此特有之條約，以為雙方信守之據。就中國近代史之特色而言，中國與西方各國建立外交關係，自始即進入條約時代，以迄於今，自為中外關係之重要管鑰。在西方學者立場，恆艷稱為條約體系(treaty system)。就六十年來中國近代史學者，尤其國際法學家，國際關係學者，則恆稱之為不平等條約時代。著作如林，隨處可見。惟重視條約關鍵，則為中西兩方學者之共同了解。史實之不幸發展，任何史家所無從排除者，蓋在此種體系下之條約，對中國全國全民之自由生存與幸福樂利，實是一種嚴酷枷索。在西方列強而言，則是外交政治之戰利品，在華特權憑藉之資本。如非憑恃帝國主義觀點，似此所謂之條約體系，真乃世界上不平不公恃強侵畧之成果。史家使命，靡有不詳加研析而一一表暴其醜陋者。

條約之割地賠款，辱國喪權，由於中國國勢衰弱外情茫昧，固然是實情。而其士民之憬然警悟者，代有其人。事先不能防範，無力抵抗，已是隱忍含垢。而事後檢討，分析損失，拾取教訓，以為後世警戒，實為亡羊補牢，未可末減。是以自道光訂立江寧條約起，歷來不斷引起反省評論。董宗遠、劉韻珂、夏燮自為此中先驅。自咸豐末年中外接觸日繁，條約愈多，而論者尤眾。同治間志剛已就中外條約，指明列強之積極逾分：

辦理交涉事務中最為矯強者，無如本為條約之所無，而指為條約意中之所有之一言。若由此言之，則何事不可牽引。是直欲憑莫須有辦事，而條約反成空殼矣。蓋其意中總以有所挾制，則無不可行之事，而情理非所論。惟美國打算遠大，不爭一時之利，餘則惟視強弱為從違，別無道理，而所以處之之道在其中矣。³⁷

張德彝論中外條約爭執，亦申說駐華公使之曲解約文：

廿九日接京信，知德國公使巴蘭達於本年修約，節外生枝。堅執舊約只有各關分納稅餉之語意。欲洋貨運入內地，惟有逢關納稅，不能更取其釐金。查洋貨之來自各國者，但經完納關稅及子口半稅，則所過釐卡，均只驗明領單，立即放行，并無重抽釐金之事。其抽取釐金者，第貨之已承自華人者耳。以中國之官卡，籌中國之兵費，而斂中國民人之稅釐，於洋商何與？不特章程不必行之各國，且各國約章亦不能涉及此事，蓋我原有自主之權，釐金應取諸我民則自取之，非外人所能過問也。彼如曰釐雖出自華人，貨則實為洋貨。則請應之日：貨皆有所自

36 同前書，第三頁。
37 宜屋著《初使泰西記》（《小方壺齋與地叢鈔本》）第二十一頁。

來，然繫屬何定之有？在洋人之手則為洋貨，在華人之手則為華貨。苟其已歸華人，則華人之主雖盡取而用之，亦非各國所能干與。君民者父子也，子之貨買自外洋，遂欲限禁其父，使不得取用，天下曾何有是理。況百中僅提其一二乎？彼如曰：洋貨重復抽釐，則華商成本太貴，不肯多買，有礙洋商之生理，故不得不涉理也。則請應之曰：爾能顧爾之銷貨，我獨不能顧我之立國乎。假令所損於我國者少，猶可曲就爾銷貨之計，以惠遠人。今抽釐之舉，專恃以餉兵。若華人之承受爾貨者又完釐，則承受他國之貨者亦必不完釐，我中國兵費將何自出乎？爾貨之賣與華人者，慮因抽釐而成本貴不能暢銷，則華貨之賣於爾商者，亦必慮因抽釐而成本貴不能賤買。推類以及將一切釐金皆不能聽我征收矣。我中國兵費更何自出乎？無餉無兵，即不可以立國，天下容有令人自棄其國以就已買賣者否？且我自棄其國，則盜賊勢必充斥，爾商之生理不但不能暢銷，亦並不能自保，是損人即以損己也。大抵爾之求索免釐，必有中國刁民圖益己財，而以稅多貨滯之說相蠱惑者。不知來自外洋之貨，非貧民日用所必需，其買之者惟富戶耳。中國富戶只有此數，而洋貨之運赴，日益無窮，即使併關稅而裁之，亦難望多所銷售，徒為刁民役使，妄費唇舌，致人謂爾無理滋事，侵我國自有之權，以乖公法，甚為貴公使不取也。³⁸

薛福成亦就全面中外交際情勢，探討列強使領在華之橫肆強悍。

竊惟數十年來西洋諸國，惟英、法與我中國素多齟齬。一二強邦迭起乘之。事變愈棘。從前英使如威妥瑪、巴夏禮等，法使如巴德諾脫(Jules Patenôtre)等，尤窺知中國情事，狃於積習，動輒要挾，勾結他國，協以謀我。興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應，繩之以約而不盡遵。其所由來非一日矣。臣嘗觀光緒三四年間舊牘，前使臣郭嵩燾初到之時，枝節不少，口舌滋繁。有明係中國自主之權而妄思侵礙者，有明係彼國訂行之款而不即照辦者。蓋彼之商人惟利是視，不顧大體，而公使領事向恃中國無駐洋使臣與彼外部辦論，往往逞其一面之辭，要求迫脅，惟所欲為。³⁹

據此畧可見出當時中國官紳對於列強曲解條約，謀求擴張特權之認識。所謂條約體系之特色，在中國近代史上，其所反映，決非正常情形，當有待史家多多研探實情，以為後世之參考。

三、春秋戰國國際形勢之回顧與近代防俄論

近代國際關係情勢以歐洲為主，而維繫國際交涉之各項制度與習慣也是源自歐洲。

³⁸ 張德彝著《英軺日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第三十至三十一頁。

³⁹ 薛福成著《出使奏疏》，卷上，第十三頁。

是以歐洲政情爲舉世重心，歐洲動態並爲舉世所矚目。世界一切變化，由歐洲推動，並由歐洲領導風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拋棄不合時宜之天朝意識與中國中心觀念，從而冷靜思考萬國林立之世局。歐洲現勢遂即成爲朝野人士熱心研討之重心。

就事實觀察，十九世紀中國朝野，議論世界重大事務，舉凡縱論天下時勢，莫不首先思考歐洲政情，列強動向。現有之新知，固爲重要參考，而衆志之所趨，亦決無分毫勉強。如王韜之分析歐洲政局之嬗變：

且歐洲今昔之勢亦甚大異。昔者英、法可以相離，今者英、法不能不相合。昔之爲強國者有七，英、法而外，如奧地、普魯士、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皆勢均力敵。今之爲強國者僅四，俄以制土強，普以勝奧強，此外諸國並衰。惟英、法足與相抗，故近年以來，普黨於俄，英黨於法，彼此以相牽制。四國中有一不和，則必有起而乘其後者矣。苟在今日，英、法自相猜貳，是遺俄、普以利也（此在普未勝法以前言）。英、法競爽，綱紀西歐，一或不振，大國之喜，而小國之憂。嗚呼！古今盛衰興廢之故，豈有常哉。盛即衰之始，廢即興之終。當英、法之啓靈海上也，粵中老人有識乾象者，獨曰：二國舉兵，皆犯天忌，棄好崇仇，必受其咎。後十有八年，法必弱，再二十有一年，英亦必小懦。歐洲有識之士，見英、法之強盛，而論其將來曰：塞納河濱麋鹿遊，巴黎城中狐兔集。車轂不經，商賈絕跡。又曰：達迷河必寂寂，貿易盡衰，鷺鷥覓魚於陸。驗其言，蓋亦預述滄桑之變幻也。然則英、法其可長自恃哉？⁴⁰

馬建忠分析歐洲國際利害互抵險詐相向之現狀：

然則交涉之道，始以并吞相尙而不明，繼以譎辯相欺而復失。終以均勢相維而信未孚。徒恃此載在盟府一二無足重輕之虛文，安足以修和於罔替。夫國與國既已犬牙相錯，自有唇齒之依。故一國之權利所在，即與國之強弱攸關。英人利在英商，埠頭遍天下矣。俄人利有南境，版土因以日展矣。普與法勢不兩立，而兵力愈精。意若嗅思復故疆，而營求未已，故泰西之講公法者，發議盈廷，非說理不明，實所利之各異。以致源同派別，分立門戶，上下數十家，莫衷一是。於是辦交涉者，不過藉口於公法，以曲徇其私。須知交涉之源流，既已因時而遞變。即交涉之才，尤貴達變以應時。此交涉之道所以存乎其人也。⁴¹

項藻馨之論歐洲政局動向：

似當今之時，處今之世，歐洲大局，幾於固結莫解。大有一國動諸國皆動，互相

40 王韜著《法國志畧》（光緒十六年，上海），卷十二，第十七頁。

41 馬建忠著《適可齋記言》，卷二，第十一至十二頁。

牽涉之勢。其整頓變易有不可終日者，其必非無故然矣。⁴²

李鴻章論國際現勢，視奧地利為歐局樞紐：

括歐洲之地勢，似奧可以蔽障強鄰。且結中為助，亦合攻近遠交之義。但久稱弱國，共笑孱主，介于兩大之間，怨未足以抗方強之焰也。⁴³

康有為論世界列國分立，明晰指出中國分位，以為自強惕勵，早已捐棄中國中心與天朝意象：

大地八十萬，中國有其一，列國五十餘，中國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輪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後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變局也。列國競進，水漲提高，比較等差，毫釐難隱。故管子曰：「國之存亡，鄰國有焉。衆治而已獨亂，國非其國也；衆合而已獨孤，國非其國也。」⁴⁴

薛福成論世局，力主中國自強，以為天下收結。過分樂觀，未免迂遠而不切實際，要亦具有雄心抱負：

今之議者，動引古聖，覈糟粕而去精華，務空談而忘實踐，失之彌遠。欲求馭外之術，惟有力圖自治，修明前聖制度，勿使有名無實。而於外人所長，亦勿設藩籬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備，不難合四海為一家。蓋中國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才力聰明禮義綱常之盛，甲於地球諸國。既為天地精靈所聚，則諸國之絡繹而來會者，亦理之固然。來書謂世界日開，其機自外國動之，其局當自中土結之。實為遠識至論。其效即不在今日，亦當見諸千百年後也。⁴⁵

嚴復申論，則論列強必不願見中國之進步與富強，並且必全力加以阻止：

夫中國雖於今為奕國，而終為外人所嚴憚。而恐為其子孫憂者，有二事焉：一曰土地廣大，物產浩博也。一曰民庶而勤，作苦治生也。以是二者為之資，設他日有能者導其先路，以言通商，則轉物材以為熟貨，其本輕價廉，以奪彼歐人之市有餘。以言兵戰，則堅忍耐戰人懷怒心，決非連雞為棲者所可及。而是二者之中，其前一尤為歐人之忌。故吾今者之故步自封，雖笑譏鄙夷，而實則彼之所禱祀以求者也。設一旦吾之民智日進，天誘其衷，幡然改之，吾知彼方奮其沮力，以與我爭一旦之命，其必不坐視以聽我之精進，又灼灼然可知者矣。⁴⁶

42 《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卷，第二十一頁。

43 同前書，第十九頁，李鴻章眉批。

44 《湘學新報》，第三十二冊。

45 薛福成著《庸庵文編》，卷二，第六九至七十頁。

46 嚴復譯《原富》（光緒二十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第六百四十三頁。

歐洲列強並峙，國土犬牙交錯，彼此勾心鬪角。陽開陰塞，外弛內張。國際關係，十分複雜，外交運用，成爲各國第一要政。中國雖已顯現積弱，而對歐洲局勢，不能不思考檢討。一般了解，易於據古史前例，引喻當前大局。因乃回顧春秋戰國情勢，採取經驗，比照分析，用以認清當前處境，進而思考對策與自處之道。一時論者興起，自然而成一致之理說，反映共同之觀點，極具參考價值。茲爲方便起見，當列表明之。

人物	以春秋戰國史例比論當代世局	倡說年代	資料出處
馮桂芬	今海外諸夷，一春秋時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即風氣亦相近焉。勢力相高，而言必稱理；譎詐相尚，而口必道信。兩軍交戰，不廢通使；一旦渝平，居然與國。亦復大侵小，強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聞有不論理不論信如戰國時勢者。然則居今日而言經濟，應對之才又曷可少哉。	一八六〇 ——一八 六一年。	馮桂芬 《校邠廬 抗議》， (光緒23 年，聚豐 坊刊)卷 下，第六 六頁。
王 韜	余之志普法戰事，豈獨志普、法哉？歐洲全局之樞機，總括於此矣。普強法弱，此歐洲變局之所由來也。普中歐洲而立國，西有法，而東有俄，皆強鄰也。曩者爲法所制，幾於一步不可復西。日耳曼南北列邦，勢渙而不聚。雖推奧爲盟主，亦僅擁虛名而已。以春秋列國之大勢例之歐洲，普僅等宋、衛焉耳，英、法、俄、奧則晉、楚、齊、秦也。近十餘年間，普國勢日尊，伐噠伐奧，坐成強大。而法方晏然於其際，猶復自恃雄盛，輕啓釁端，此法之所以幾覆也。昔普興而奧衰，論者遂以普、法、英、俄爲四大。今普強而法弱，論者乃舉英、普、俄爲三雄。然而法國之興衰強弱，實爲歐洲變局一大關鍵。何則？以地當衝要也。若英雖雄強，其地僻懸海外，無繫於大局。故以法輔英，則英益強；以英輔法，則法不蹶。昔之英、法常相攻，以其時歐洲諸國勢均力敵，皆不足以制英、法也。今之英、法常相合，以俄驟興於東方以制土強，普崛起於西境以制奧強，皆足與英、法抗衡而爲難。以英、法、普、俄並峙，可以維持歐洲，互相牽制，以幸無事。四者之中弱一個焉，則必不能成鼎足之勢，事變之來，所必然也。	一八七一 年	王韜《普 法戰紀· 前序》。
殷兆鏞	按泰西大小各國以數十計，而不能統于一尊。最大者爲	一八七五	

- | | | | |
|------------|---|--------------------|---------------------------------------|
| | <p>俄、爲英、爲法、爲米，而普魯士後出，亦頡頏其間。與中土從前之戰國絕相似，互相聯絡，互相猜忌，更互相防維。故歷次條約中必云：如後有施恩之處，各國一律均沾，其牽制鈐索之隱情，大可概見，斷不能一國獨啓兵端。</p> | <p>——一八七八年。</p> | <p>朱克敬《邊事續鈔》（光緒六年，長沙），卷五，第三頁。</p> |
| <p>羅應旒</p> | <p>各國之人，在吾中國者，如附骨之疽，不能剔去。出入我所，若履戶庭。既不等前朝邊患有彼疆爾界之可守，則亦天地自然之運會，至於今而一變其局，使各國相通有如周列國之世，而成此大列國矣。當仿周列國之內修政事，外聯和好以治之。亦如外洋交通之各國，遵守萬國公法以治之。</p> | <p>一八七九年</p> | <p>《洋務運動》，第一冊，第一七〇頁。</p> |
| <p>黃遵憲</p> | <p>余聞之西人，歐洲之興也，正以諸國鼎峙各不相讓。藝術以相摩而善，武備以相競而強，物產以有無相通，得以盡地利而奪人巧。自法國十字軍起，合縱連橫，鄰交日盛，而國勢日強。比之羅馬一統時，其進步不可以道里計云。其意蓋謂交鄰之有大益也。余因思中國瓜分豆剖，干戈雲擾，莫甚於戰國七雄。而其時德行若孟、荀，刑名若申、韓，縱橫若蘇、張，道德若莊、列，異端若楊、墨，農若李悝，工若公輸，醫若扁鵲，商若計研、范蠡，治水若鄭白、韓國，兵法若司馬、孫、吳，辯說若衍、龍，文詞若屈、宋，人材之盛，均爲後來專家之祖。一統貴守成，列國務進取，守成貴自保，進取務自強。此列國之所由盛乎。特其時玉帛少而兵戎多，故未見交鄰之益耳。</p> | <p>一八七九——一八八六年</p> | <p>黃遵憲《日本國志》（光緒16年，廣州富文齋），卷四，第一頁。</p> |
| <p>彭玉麟</p> | <p>當今日之時勢，強鄰日逼，儼成戰國之局，雖孔、孟復生，亦不能不因時而變矣。嘗讀《春秋》，知當時君相，無不周知各國山川險要，風俗民情，君臣賢否。日求富強之策，不以資格限人，似無異於今日泰西各國。我朝懷柔遠人，海禁大開，亦當知某國何以興，某國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見本源，方有着手之處。豈徒尙皮毛購船礮而已乎？</p> | <p>一八八四年</p> | <p>鄭觀應《盛世危言》，彭序。</p> |
| <p>薛福成</p> | <p>今地球大勢，頗似春秋之後，戰國之初。俄羅斯以一面</p> | <p>一八九一年</p> | <p>薛福成《出使日</p> |

制三面，諸國畏之忌之，如六國之攢秦。而俄之日趨強盛，頗如秦獻公、孝公之時。英之國勢，與俄相匹，而富強過之。殆猶楚宣王、威王之時，初併吳、越，地廣人衆，而衰微尙未見也。法蘭西本霸國之餘，拿破崙第三其猶齊閔王乎？德意志用賢才以勃興，地不甚大，而國勢可抗英、俄，殆猶趙之幾與秦相匹乎？美國僻處一洲，自關疆土，亦猶燕之僻在一隅，而戰爭之禍較寡焉。奧斯馬加，意大利四戰之國，猶韓、魏也。中國尙文德而不競武力，頗有宗周氣象，然猶似在春秋之前，非若戰國二周之弱小也。土耳其處兩大洲之中，爲英、俄、法所窺伺，孰先得之，皆足以廣地而張國勢，恐不免如戰國之宋，爲齊、楚、魏所分裂也。日本國雖小，常有與諸國頡頏之意。其猶中山乎？其餘諸國，殆如泗上十二諸侯焉耳。嗚呼！天下事有始必有終，今之形勢，吾不能測其所終極。

記續刻》
，卷三，第
二九頁。

許克勤

觀於西伯利亞之鐵路，俄汲汲於營造，而法人既佔越南，又有屯兵之所，此固未可知之數，而不可不思患豫防者也。是俄、法之連衡，不惟一德之患，抑將舍西而趨東，置歐而圖亞，而重我中國之憂矣。所謂俄非法而不得逞其欲者，此之謂矣。試思德皇之立，兩朝於俄，以求援於俄，而卒不可得。以彼皆姻婭之國，而猶漠然置之，況其爲中國也哉？故將來干戈之作，不在於歐，即在於亞，而其爲大戰國之機，固已於德、奧、義合縱，俄、法連衡見之矣。

一八九二
年

《格致書
院課藝》
，壬辰卷
上，第六
頁。

項藻馨

就天下大勢而論，爲春秋時一大戰國，德比之於燕，奧比之於楚，義比之於晉，法比之於齊，俄比之於秦，五方並峙，約縱連橫，其堂堂上國，居正朔而大一統者，其惟我中華乎。

一八九二
年

同前書，
第二十頁
。

錢文需

古之戰國居亞細亞洲之一隅，而約縱連衡者七國。今之戰國居歐羅巴洲之全境，而約縱連衡者五國。嘗攷歐羅巴洲之形勢，以德意志之日耳曼爲中原。而德意志之普魯士東西兩部環其東北西北，夾日耳曼北面之左右，主

一八九二
年

同前書，
第十八頁
。

日耳曼之東南為奧地亞，日耳曼之南曰瑞士，瑞士之南，斗入地中海者，曰義大利亞。此歐羅巴洲各國合縱之大勢也。至日耳曼之西，最強之國曰法蘭西，日耳曼之東，最強之國曰俄羅斯。法蘭西之西境，直界大西洋，俄羅斯之東境，直跨亞細亞洲，此歐羅巴洲各國連衡之大勢也。

楊毓輝

方今歐洲各國，犬牙相錯，棋布星羅，其上則好大喜功，各思闢其土地。其下則揚威耀武，每欲逞其才能。人心之不齊，亦已甚矣。各國中若德、若奧、若義、若俄、若法，皆強國也。以強遇強，咸有戒心，遠交近攻，各結黨援，於是合縱則德、奧、義固，而俄、法無以伺其隙；連橫則俄法亦固，而德、奧、義無以狡其謀。是蓋互相維持，亦互相鈐制也。

一八九二年

同前書，第二十九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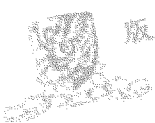
宋育仁

歐洲大勢如戰國，而公法欲反之於春秋。耶穌欲以教廢國，故但言天命，不論治理。自埃及、羅馬、希臘皆立國數千年，教力所不能廢。其餘諸國并起，爭殺相仍，教皇既立，因以教輔政，而不能禁殺勝殘。教士虎哥，乃創為公法，初名平戰條規，既無禁戰之權，又無禮教以為持論之本，惟推原於性法，與上帝示命善惡之別是矣。惟蔽於功利之恆習，囿於權勢之俗見，不敢直斷爭城據地之非，故說多依違持兩端。霍畢士、布番多以降，言公法者十餘家，其說愈紛歧。正如書吏舞文，出入失律。欲以止爭，而適以啓爭。不如中國聖人制禮，即以性法為本。《春秋》進退，即以禮教為衡。《禮》與《春秋》，乃真萬國之公法也。西教未聞，無所依據，故後學之徒，支節而為之。丁建良畧讀中國書，知公法起於《春秋》，刺取《左傳》，為中國古時公法一卷。但引傳而未嘗知經，窺見一斑而已。竊觀今日之西域，有制度、文章、聘盟、朝會，俘人之君必加禮，滅人之國必復封，與水草遊牧蠻夷無道者迥殊。但可視為春秋之吳、楚，不能待以春秋之潞狄。國富兵強，人和政理，正宜進之以禮，不能威之以兵，因其公法，引經為之正定，明其所疑，譯而布之各國。西人好勝，亦好精

一八九三年以前

宋育仁《采風記》，卷五，第五至六頁。

涂儒齋	微之思，必能由攻生悟，不令自行。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經術之用也。	一八九五 ——一八 九七年	《沅湘通 藝錄》， 卷三，第 五五—— 五六頁。
戴丹誠	今之論五洲大勢者，曰俄、法、英、德、美。皆稱強地球之上，無異晚周之六國。其餘次等三等之國，以數十百計。皆犬牙相錯，日虞大國之兼并，而眈眈之視，逐逐之欲，卒相顧莫敢先，而以扶植同洲，籍固藩屏之勢。則各國之私心，已不啻顯揭。諸人所由，尚能以公義相聯絡，則無非利不獨沾，患不獨承之隱衷，不殊彼此。故今之泰西隱情，以虞匿怨而友必終不保其未隙之不開也，噫！	一八九五 ——一八 九七年。	同前書， 卷四，第 十九頁。
周傳德	夫今日五洲各國之勢，亦一大春秋也。強凌弱，衆暴寡之時，有不周知情法，洞悉利弊，俾外夷生心，強鄰四起，而欲免於危殆，安可得哉？	一八九五 ——一八 九七年	同前書， 卷四，第 二五頁。
劉光蕢	故以今日例春秋，中國猶晉也，俄猶秦也，英猶楚也，法、德猶吳、越也。合地球九萬里，而為會同朝聘之局，固開關來衣冠玉帛之創見哉。	一八九七 ——一八 九八年	劉光蕢 《煙霞草 堂文集》 (民國七 年，蘇州)卷七， 第六四至 六五頁。
	六國與燕為鄰，勢力相敵，無所畏忌。燕國若併於齊，則齊比各國強大，將為各國大患，諸侯謀救燕，其謀為自己非為燕也，與今日英、日、美、德不取中國土地同。日本與中國同洲同種，與俄鄰。中國若亡，俄與日本相接。日本國太小，不能敵俄，則日本之禍亟矣。英國與中國通商，得十分之七。各國不及其三，中國若亡，將轉而入俄。即英佔據長江南岸，保收南省之利，而俄較英國土地為大。俄既得志於東，必從北印度又侵英之印度，印度若分，英之土地不能聯絡中國，通商之利將不能守，而亦入於俄。英人之迹，將絕於中國，而英不能國矣。此英所以保全中國也。美素不預外洲事，而以自保其國之權利為本然，其北洲有俄屬地，與俄西北利省之卑令峽接，海闊僅百餘里。俄若得志於中國，必經營此處，而美之北洲震動矣。故美以不顧外洲之國，此次亦挺出而與英、日聯謀同保中國也。德在中國始得膠州灣，基址未固，瓜分中國，不能多得地，非德之利，德亦不願中國亡也。惟法在南洋之勢畧近於英，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而依俄以讐德，德、英甥舅之國，深結以爲固，故法願中國之亡，而已得志於南以撓英，俄得志於北以制德，之讐復，而南洋之利亦或獨擅之也。

譚嗣同

頭次所講云：中國艱危，曾土耳其之不若，真是古今奇變。然吾約計，開關以來，戰國與今日遙遙相映，時局雖皆極危，卻又是極盛之萌芽。

一八九八年

《譚嗣同全集》（北京，一九五四年）第一二八頁。

就表列所見，諸人議論世界現勢，以春秋戰國之爭持霸業，比擬歐洲列強之對立競勝。或不免斥其固陋，或不免譏其淺薄，或不免笑其傳會。據現時眼光與立場，衡度前代人之思想意趣，自難容此類理說之存在。但就思想觀念演變過程觀察，當具有時代意義。第一，此種議論，非一人杜撰，原始有相當感染効力，或各自參驗固有知識，竟不期然而生相同論調。此即反映固有知識經驗，所發生潛在影响。人們遭遇新問題，必然回顧過去，就已得知識中尋求對策。第二，諸人議論世局，反映出兩重認識，一爲列國紛爭之國際形勢，構成所面臨之新環境。一爲古代從衡捭闔之政局，復呈現於今茲。此點關係最大，蓋此一觀念雖在參考古舊史例，實有助於認清當前世界現勢。本之於此，可以自中國中心觀念順利轉渡到對等國際關係之體認。當前列強競峙，中國爲萬邦之一，一若往史中之春秋戰國。對等之交際，彼此之競爭，從衡之政術，大小之兼併，勢須一一思考，急切適應。第三，一般議論所趨，既經探討國際動態，終不免回顧從衡家之活動與其威力。對於中國之應付外交，當會加強警覺，小心提防傾覆。亦不得不更加關心國際情勢變化，謀求獲得正確了解。

中國官紳之回顧古代史例，取借春秋戰國經驗而認清世界，並以合從連衡情勢，解說歐洲列強之對立爭勝。陽開陰塞，外弛內張，押闔從衡，勾心鬪角。則自知面臨複雜世局。至於構思應付之策，仍不能不參酌前史，依循春秋戰國情勢，比論列強並爭雄長之世界。一般而論，對於歐美五強，英比於楚，法比於齊，德比於晉，俄比於秦，而以美比於僻遠之燕。諸國形勢，與古絕無相類，惟以俄國比強秦，則最爲神似，言者動容，聞者傾服。中、俄接壤之地，歷世爲俄蠶食，尤痛感切膚，憂心隱患。

近世俄之驟興，西乘土耳其帝國之瓦解，東歐西亞，盡入掌握。東乘中國之衰弱，侵吞中國東北廣大領土，蠶食中亞七國藩屬，駸駸而進畧邊地。環中國三面包圍，成爲中國獨立生存之永世威脅。中國敏覺之士，探討列強競逐之世界，自戰國前史研判，以強秦之擴張，引喻俄國之野心。而俄人之陰險狠鷲，冷酷殘忍，百倍於秦。中國居爲近鄰，歷年受其翦削，而潛伏之害，尙難測知。爲謀獨立生存，不能不提高警覺，加意防範。各方研議討論，申說戰國強秦併滅六國之情，警惕俄人狡謀，與其駸駸東向之野心，於是而滙爲一代之防俄論。茲予列表，以明其意趣宗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人物
王 韜

防 俄 論

今日之歐洲，據時勢以立論，普、俄兩國最為雄。然普雖強僅能持歐洲之變局，而於亞細亞無與也。於我中國更無所關繫。蓋普但能弱法圖英以駕馭歐洲諸國，而不得為中國患。何者？以距中國遠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謀有所未遑。況乎水攻戰艦之長，乘風破浪之技，俱不逮英、法？則普於此或將尚有所待也。若俄則地跨三洲，控拉百萬，於阿非利加，亞細亞兩洲，皆足繫於重輕，取土耳其之埃及，則足以扼歐洲諸國往來之咽喉，而執地中海、紅海之管鑰。若由亞細亞中境肆其蠶食鯨吞，則印度一隅幾與犬牙交錯，而英之外府漸有可虞。至其經營黑龍江一帶者，已歷多年，通商勸農，百廢俱興，日前之所為棄土者，今幾視之為重鎮。普俄交好既密，可無西顧之憂，法既為普所弱，僅能自保，何敢復與俄敵。奧地里、土耳其，雖地廣兵多，然實不可用。意、西、葡、荷、瑞、比、噠、撒諸小國，僅比諸滕、薛、邾、莒，而已。其足與俄抗者惟英耳。而以俄之強且大，當非英獨力之所能制，環顧歐洲中，休養生息強兵厲武，法雖蹶而可興也。英欲拒俄，勢必聯法。然英、法合併，亦祇以支持歐洲之大局，阿洲之偏隅耳，而猶恐不能兼顧乎東方也。俄既不得逞其西畧，則將肆其東封。俄勢日東，則其強益甚。舉天下之利權盡歸掌握，英法至是雖欲爭而不得矣。然則必欲牽制乎俄，天下諸國無能當之者，惟中國則庶乎可矣。在歐洲諸國，為今日計者，莫若英、法強中以禦俄，中國幅員之廣過於俄、美、英，而生齒之繁幾半地球。近來仿製船礮，技美法精，機器日興，藝巧迭出，誠得英、法以為助，其強當無敵於天下，於禦俄乎何有？此非英、法為中國，實英、法自為計也。不然者，英、法離，普、俄親，中國弱，東土蹙，普為俄用，遂展雄圖。恐法削而英亦將不競，天下從此殆哉，有心於天下大勢者，當不河漢斯言。

鄭觀應

俄國地廣兵強，志在兼併，方諸列國，無異嬴秦。

抒論時代
一八七一年

資料出處
王韜著
《普法戰紀》，卷二十，第四三至四五頁。

一八七五
——一八七九年。

《易言》，卷中，第十頁。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 | | | |
|-----|--|-------|-------------------|
| 王炳耀 | <p>歐洲稱雄者莫如英、俄、普、法，普、法毘連，有兩不並強之勢。英、俄雖隔東西，而暗相顧忌，各視為疾心之大患。先因英、法聯以制俄，故黑海之盟所以欲弱俄也。及普法之役，俄改前盟，亦所以欲弱英也。惟美國處亞美利駕，獨雄一洲，無強鄰之患，得以自強。亦猶我中國處亞細亞之東，獨蓋一洲，無大國之慮也。所慮者惟一，非普、法亦非英、美，一俄而已。今日之雄雖稱英、普、法三國，後日觀之，非美即俄。美國獨居，原無拓土之思；俄國蹙近，必有蠶食之勢。為今日計，宜交英防俄，而親普、美。卑牧虛受，文治則學普，武備則學英，水戰英長天下，而陸戰普壓寰區。水陸並求，於西北多建砲臺，東南多備戰艦，以固全國之險隘。則西北可以防俄（羅）斯，拒天竺。東南亦可以制日本，收安。南得與英、俄、普、法並駕齊驅，共議天下之大要。</p> | 一八七五年 | 《萬國公報》，第三冊，一六四五頁。 |
| 薛福成 | <p>跨兩洲之地，負北冰海而立國；利則乘時進取，不利則蓄銳觀變；有長駕遠馭之謀，有居高臨下之勢。則俄羅斯固天下莫強之國也。邇者泰西諸國，畏俄忌俄，如六國之攢秦。據守海道，扼其咽喉。俾俄之水師不得縱橫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陸路，未騁厥志，輒思發憤為雄。土耳其一役，覬得黑海，為訓練水師之地。及英人出而阻撓，始立約罷兵。然已割土國腴壤，立為附庸之國者四。俄之號令，駸駸越黑海而南，彼又於歐、亞兩洲之間，蠶食諸小國，烽火將達印度北境。英之君臣，盱食深謀，而無如何也。德人藉俄之援以破法而弱英，英亦熟視而不敢救。而德、奧諸國之於俄，又未嘗不畏而防之。然則俄為歐洲諸國之憂也久矣。雖然，俄之憂在歐洲者顯而緩，俄之在中國者隱而重，何也？俄之邊境包中國東西北三面，橫互二萬里。自踞守伊犁之後，其近邊浩罕諸國，與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彼皆以兵威脅服，已不啻撤我外藩。東三省自黑龍江以北綏芬河以東甌脫之地，割歸俄屬者數千里，不特庫夏島為俄所有，即吉林所屬，割去之地已多。其野產貂，其人漁獵。俄</p> | 一八七九年 | 薛福成《籌洋芻議》，第五至六頁。 |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王爾敏 不得翻印

人建屋墾荒，開鐵產，俯糶糧，買牛羊，設輪船公司於黑龍江上，經營井井，殆有深意。且彼所居之圖們江口，距陪都根本之地千里而近，形勢尤嫌單薄。又聞寧古塔、琿春等處旗民，每被俄人侵侮陵暴，至不能安其生理。且時有尋釁之意。夫以歐洲諸國，與俄人比權量力，非不互有勝負，然不能不畏之者，地勢使然也。中國兵力餉力未逮歐洲一大國，而彼尚可合縱連橫以拒之，則其勢盛，而中國之勢孤。諸國扼守要害，不過數處，非若中國之防不勝防，則其勢專而中國之勢散。而況中國練兵製器之精，傳信行軍之捷，百不如西人。俄非無事之國，不得於西，將務於東，此必至之勢也。

張煥綸

今日之俄，七國之秦，而英則齊，土則魏也。秦人不得志於魏，不能躋六國，秦人不得志於六國，齊爲之也。俄人不得志於土，不能躋歐洲。秦人遠交齊而近攻魏，秦之得志於六國，齊爲之也。英人陽護土，而陰蔽歐洲，俄之不得志於歐洲，英爲之也。伯靈城之會，各國公使多觀望游移。豈不曰英之護土，護印度也，私也。是豈誠然矣。豈知印度危而英危，英危而歐洲諸國亦必危。且豈惟歐洲諸國哉，誠能未雨綢繆，厚結英好，英既德我，俄亦不敢正視。而新疆回部，地近印度，俄人挾以要我，俄人得志於新疆，亦英人之憂也。異時或當得英之助，出爲排解，英既出全力以護土，獨不能稍有餘力以助我哉？

一八七九年

曾紀澤
《曾惠敏公使西日記》（民國廿一年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卷一，第八頁。

劉銘傳

中國自與外洋通商以來，門戶洞開，藩籬盡撤，自古敵國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強也。彼族遇事風生，欺凌挾制，一國有事，各國環窺。而俄地橫互東西北，與我壤界交錯，扼吭拊背，尤爲心腹之憂。我以積弱不振，不能不忍辱含垢，遇事遷就，不惜玉帛以解兵戎。然而和難久恃，財有盡期，守此不變，何以自立？

一八八〇年

《洋務運動》，第六冊，第一三七頁。

徐承祖

查外洋各國，以俄羅斯爲極強大、極貪狠之國。地近我疆，時生窺伺覬覦之志，幸爲歐洲各國所忌，未敢公然肆其強暴。即英、法、德及凡在歐洲各國，亦無不彼此互相猜忌。

一八八四年

《洋務運動》，第一冊，第二四六頁。

- | | | | |
|-----|---|-------------|-----------------------|
| 張涵中 | 夫與我逼處，足以爲肘腋之患者，不在英與法也，而在俄羅斯。故又以四境之形勢策之，俄羅斯者，必防之國；英、法者，必交之國，朝鮮者，必存之國；日本者，必討之國。俄羅斯若欲肆其東封，必首謀高麗，以關海東之門戶。英人以商務而必爭，日本以伺隙而必動，我既修好於英，而以兵力示倭人，使箕子遺封，長爲我之藩籬。朝鮮無事，則俄之海軍無所用其力，是以防俄之策，其重在陸而不在海。 | 一八八六年 | 《格致書院課藝》，丙戎卷，第四七至四八頁。 |
| 崔國因 | 方今地球所有之國，其彰明較著而號爲強大者：曰英、曰法、曰俄、曰美、曰德，共五邦也。臣以爲惟俄最强，亦爲俄最可慮也。曷言乎俄最强也？英之強也，水師甲於天下，德之強也，陸兵精於訓練，美以富強，法雖水軍遜於英，陸軍遜於德，而水陸二軍合之，亦足爲強。然是四國者，距中國較遠，距東三省尤遠，越國鄙遠，鞭長莫及。俄則東西北三面處處接壤，陸兵之強，甲於天下，德國挾全盛之勢，足以滅法而不敢失好於俄。聞德國之君於今年春歿時，諄屬其子及相臣畢思麻、將軍毛奇特，以後切勿與俄開釁，則俄之強可知矣。俄人自得克什米爾、布魯特、哈薩克諸部，已至地球之溫帶，其東境與後藏阿里毗連，其北境與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毗連，是其地已包乎東西北三省。唯所欲之，無不通達。歐洲諸國既合衆以拒之，勤而無所，必有蠶食中國之心。聞其於上年從加斯濱海造鐵路，漸達琿春、海參崴，工程至今，已將及半。以後鐵路告成，軍行既速，餉運易繼，彼之費銀累萬萬兩，果何爲哉！然則俄之垂涎於東三省，固大彰明較著者，臣故以爲尤可慮也。 | 一八八八年 | 《洋務運動》，第三冊，第五六五至五六六頁。 |
| 陳 虬 | 夫今日之俄羅斯，戰國之強秦也。五洲諸國皆有約縱之意。故俄欲出紅海併甌洲，則英、法扼之於土耳其。俄既不得志於西，將鼓棹東向朝鮮，英人又踞巨文島以制之。近又營鐵路於西卑利亞，將次告成，由俄京達高麗十五日耳，俄若得志於東，非唯中、高無窮之慮，抑亦太西之所深患也。 | 一八九〇——一八九二年 | 陳 虬《經世博議》，卷四，第十六頁。 |

朱正元	<p>諺有之曰：遠親不如近鄰，若鄰將我害，則又不能不借遠以制近。曉之以利害，密之以邦交，則聯絡歐洲各國誠亟亟矣。查與俄接壤者，西為瑞典，西南為德國，再南為土耳其，南為波斯印度等諸小國。東南一帶則與我連壤也。瑞雖惡俄，而力非其敵；土耳其固雖褊小，得諸國助，最為俄所忌。德與俄則兩相畏，兩相忌者也。近來與我邦交尚密，凡我所需機械，大半由其承造。聯德制俄，自是上策。俄東則德擊其背，俄西則我躡其後，雖有輪船無所用之。雖有鐵路，而力已分。至英、法之助德，則又不待我勸矣。</p>	一八九一年	《格致書院課藝》，辛卯卷上，第五頁。
林季賢	<p>俄人積思蓄慮，不惜重費，興此鉅工（指西伯利亞鐵路），其志豈在小哉？窺其用意，大有效法秦人兼并之策。其誘降錫伯利各部也，不煩一兵，不耗一餉，得地萬里。正如孝公之用商鞅，堅守關中，務本力農，以修耕戰。用其詐謀，拱手而得西河。因韓、魏自潰之勢以蠶食之。而其經營亞西東部也，徙民實邊，通商興工，化磽瘠為豐庶。正如秦惠王之初，北取義渠，西并巴蜀，南兼漢中，未嘗一出函谷而國日富強也。其聯好歐洲諸國，而盡力於亞洲也，正如秦用范雎之謀，遠交近攻，欲蠶食五國而予齊為東帝，使之坐視五國滅亡，而不一謀，不發一兵，以拯救也。嗟夫！凡事於其未然而謀之，則易為力；及其已萌而圖之，則難為功。俄之經營籌畫，其奸謀已露矣。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之時雖曰無事，正賈生所謂積薪厝火時也。所願當事諸公，臥薪嘗膽，內思禦侮，以保藩籬，外結強鄰，以為犄角。網繆未雨，使之無隙可乘，豈非社稷蒼生之幸哉。不然，括囊守祿，冀幸及身之無事，恐俄人養盛滿之銳，憑席捲之勢，一旦因利乘便，如征鳥凌風使翼，而莫之天闕也。林文忠公云：「終為中國之患者，其在俄羅斯乎？」信哉言之，信哉言之。</p>	一八九一年	同前書，第八頁。
彭壽人	<p>夫俄之圖我，已蓄意於數十年之前，所以未發者，尚有</p>	一八九一	同前書，

待耳。今者西伯利亞鐵路告成，此正飛揚跋扈之秋也。我苟不以全力禦之，坐失事機，自棄險要，如疆圉何？故曰：防海緩而防陸急也。夫難易緩急勢也，知其難而黽勉以赴之，知其急而奮迅以圖之，此固審勢者之所為也。事有次第，未遑兼顧，則當後其所難而先其所急，俄將圖我，必先發難於高麗。高麗小而孱，取之甚易。俄據其地，旁溢側出，可以蠶食東海，其耽耽窺伺也久矣。彼豈不知高麗為我之藩屬，而敢於狡焉思逞者，將以覘我之虛實也。一旦假道於我以伐高，我若置諸不顧，俄則得高以自廣，夙願償矣。我若與之爭拒，俄即有所藉口，以圖高者圖我，此必然之勢也。高麗自顧不暇，日本不知輔車相依之誼，英雖以印度之故，積恨於俄，然相距甚遠，未必能出力以助我。此時為拒俄計，惟有整頓東北陸防，建築炮壘，以扼險要，添練防兵，以壯聲威；趕造鐵路，以運兵餉；增設電線，以傳消息。彼以全力注我，我以全力拒之，庶不致為彼所乘。

年

辛卯卷下，第十六頁。

項藻馨

吾嘗默看天下之時勢，而知中國之所防，不在於諸國，而獨在於俄。夫諸國雖有輪舟電報之利，然涉重洋歷險阻，調兵轉輸，往返百日，以爭勝於數萬里之外，其勢更難。獨俄則跨有三洲，西足以制歐羅巴洲，而東南足以制亞細亞，地形便利，莫有及者。然則西伯利之造路，吾恐十年以後，中、日兩國之陸路商務將盡為俄人所奪。尤可危者，一旦事生不測，適有邊釁之事，俄人調兵運餉，呼應尤靈，不出兩旬，可將十萬援兵，調赴邊界。由歐洲至中國，向之多費轉折者，今而後僅半閱月，即可戾止矣。

一八九一年

同前書，辛卯卷上，第十九頁。

許克勤

俄而有事於東方，人皆畏其虎狼之秦，而吾以為不足畏也。中國地大物博，非彼土多不毛之比也。且人材輩出，忠義勃發，非彼桀驁不馴之侶也。今雖有哥老會匪與洋教為難，易以啓釁，而非彼之結黨橫行，目無君上之徒也。誠及是時勵精圖治，內省無益之費，外成必勝

一八九二年

同前書，壬辰卷上，第六頁。

葉瀚	<p>之軍，則他日天下有事，觀釁而動也可已。</p> <p>夫歐洲各大國今尚強盛，已虞不足抗俄，誠以俄地形利便，畧如戰國之秦。為俄計，統一全球，約有三策：一以師船出黑海，得君士但丁海峽，就黑海地中海紅海西北取奧，東南窺英印度，令德孤立以僵斃，此上策也。德、奧、意約一解，俄必行之。為鐵路於東北，以圖高麗、東三省，從混同江口佈鐵船於太平洋，以奪高麗、日本、中國、英國之利權，以漸圖印度。印度去而英亦不支，此中策也。俄若不得志於西北，東北鐵路成，俄即行之。一據伊犁以觀兵青海，通波斯以取印度，此下策也。中能自強，英能自保，德、奧、意縱約不解，俄不得已始行之。然而合縱不解，西人之利大，非中國之福也。俄人志在吞并，固不待言。不得志於西，必逞志於東，亦不待言。吾所慮者，德、奧、意共保於西北，英自保於東南，揆其情勢，皆無助中之理，蕞爾高麗，朝不保暮，東北數千里一無防禦，不足敵一俄。況俄、法相合，如虎傅翼。不獨俄亟欲圖中，法亦挾俄之勢力，不得志於德，轉而取利於中。兩國并力，一援不至，中其岌岌可危哉。若西國多事，誠免東顧之憂矣。然俄欲無厭，既得志於西，東畧之念，將益熾盛。中雖暫能免禍而卒不能免。知時者不可不澈底計之也。吾故曰：中國非自強不可也。</p>	一八九二年	同前書，壬辰卷上，第十四頁。
錢文需	<p>夫俄國之盤踞於亞細亞、歐羅巴兩洲也，猶之一長蛇也。其西界之至奧地利亞者，其首也。其中間南界哈薩克北界白海一段，二面最狹，其咽喉也。其東界黑龍江者其尾也。今使以奧地利亞當其首而角之，中國為之連其吭而扼之，截其尾而擊之，俾之節折而體解焉。則其連衡之大勢可散，而天下之大患亦庶幾可去矣。</p>	一八九二年	同前書，第十九頁。
楊毓輝	<p>竊嘗觀當今大勢，而知合縱之舉，不過為制法制俄之計，非有他也。觀三國之盟詞從可知矣。而俄法之連衡，則非徒制德也，非徒制奧也，非徒制義也，而將不利於亞洲各國也。並不利於英吉利也。曷言乎不利於亞</p>	一八九二年	同前書，第三十頁。

洲各國也？俄人心計，最爲叵測，而又最貪。每欲狡焉思逞，啓其封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中國當髮逆之亂，彼竟窺伺邊隅，坐收漁人之利。黑龍江以南之地，半爲所據，復屯兵黑海，蠶食回邦。光緒初年，又有伊犁之事。其爲患亞洲，非一日矣。邇來三次派員，遊歷新疆、兩藏各處，探訪地徑，繪畫地圖，且以小惠示信於人，以爲要結之計，並屢次派員，查中俄交界兩國炮台，及兵力強弱多寡。近又造西伯利亞鐵路，聞其議分三段創造，第一段由湯姆斯克至歐庫斯克，名爲西伯利亞中央鐵路。第二段由歐庫斯克之興凱湖邊米梳甫基埠，至斯脫留聽芷克埠，名爲他蘭土咩卡露鐵路。第三段由鴉士敷釐河旁之砵忌拉甫士基埠，至海參崴。逼近琿春地方，另造支路，以通內地，可由彼得羅堡，直抵中國邊界。然則俄人心計豈在小哉。其所以至今未見舉動者，則以獨力或恐不支耳。今與法連衡，則陽以爲控制三國之計，實則同心合志，隱以蓄窺伺之謀，是敵向猶恐力不足也，今連法則游刃有餘矣。向猶謂時未來也，今連法可相機而動矣。非特中國邊境宜嚴密設防，卽高麗、日本亦不可稍事疏虞，致貽噬臍之患。留心世道者，當不河漢斯言。此可見俄之與法連衡，實不利於亞洲各國也。

陳 熾

俄人蠶食鯨吞，見利忘義。彼何愛于中國，獨能善保初終。故西伯利亞鐵路之工不成則已，成則必敗前盟，必攻中國，斷斷然無可疑者。秦霸西戎，東面以臨天下。俄背北海，南下以爭中原。先後同揆，若合符節。故俄羅斯者，今日之強秦也。德相必思馬克曰：俄地如長蛇，蔓延三萬里，荒遠寒瘠，他人所棄。而西界歐洲，東鄰中國，皆富庶之名邦也。若權衡然，輕重相等，彼得中國，必滅歐洲，彼得歐洲，亦必併中國。惟東西合力拒而塞之於內，始可永持大局之平。英國君臣深闕此意，舟師鐵艦隨所向而犄之，然陸兵無多，必結援他國。歐洲之近俄足以敵俄者惟德國；亞洲之近俄足以敵俄者惟中朝。故德之與中，相距七萬里，而唇齒相援之

一八九四年以前

陳熾《庸書》（上海慎記書莊）光緒廿三年，卷八，第一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王爾敏

局天定之矣。德聯奧、意以保土，中聯日本以保高。俄人用兵於西，則德合奧、意禦之，而中國議其後。俄人取道於東，則中合日本擊之，而德國搗其虛。英以海軍游擊其間，水陸相資，首尾相應，則柙中虎兇，雖永不復出焉可也。噫哉斯言，泰西之蘇季子矣。

向學耿

今之俄非昔之秦乎，蓋其蓄意東向以爭衡，而朝鮮實司其關鍵，故不得不急起以爭也，爭朝鮮實所以爭中國耳。

一八九五
——一八
九七年

《沅湘通藝錄》，卷四，第三三頁。

近世慮俄為中國大患者，首倡於林則徐之譎戍新疆。事在鴉片戰後不久。識見卓越，後世傳誦。林氏在新疆著有《俄羅斯紀要》一書。留心俄國蠶食邊圉。曾語後輩云：「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畧》，台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卷廿五，《名臣》，頁四。嗣後俄人東進日急，侵土畧廣。中國衰弱益形顯著，國人引為隱憂。盱衡時勢，終不能不為防俄之計，而議論所趨，遂亦滙為一代之防俄論。蓋亦國際現勢之醒覺，而深知中國之處境如何。諸人所籌對策，起初不免粗淺，終至醞釀深熟。或據基前說，閱歷史實，踵事增華，縱論世勢，遂至達成深入了解。若薛福成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即為防俄之言，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屢作研議，識慮周詳，洞察今昔，推斷世變，如瞭指掌。⁴⁷薛氏固尚為政府官

47 薛福成著《出使日記》（光緒十八年刊），卷六，第六二至六三頁，光緒十七年二月三十日，『俄羅斯一國，商務之旺不如英，水師之盛亦不如英。地產之富不如法，工藝之良亦不如法。陸師之練不如德，學問之精亦不如德。然則俄當為英、法、德諸國所弱矣，而諸國非但不敢蔑視之，且嚴憚之者何也。俄之地形，廣博無垠。以一面制三面，有長駕遠馭之威，有居高臨下之勢。且曠土既多，以其地之產養其地之人而有餘，是得地利。秋冬結冰，入夏始解，雖有強兵猛將，不足以病俄。拿破崙第一墨斯科之役，乃其前鑒，是得天時。俄之君權特重，非若各國有上下議院之牽制。且其開國較遲，所用將相大臣，頗有純樸風氣。是得人和。惟俄之立國有與西洋諸國不同者，所以一切要務雖多不如諸國，而諸國終無如彼何。且視俄為頭等強國。各有瞠乎其後之勢。況俄與西洋諸國政俗畧同，講求要務，數十年後，商務未必不日旺，武備未必不日精，工藝未必不日良，學問未必不日新。以俄之諸務不如西國，尚得最強之勝勢，若其一旦諸務與西國相頡頏，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矣。此英、德諸國所以長慮卻顧，而隱憂莫釋者也。』

又同前書，六十三頁：「夫俄不有事於天下則已，俄若有事於天下，東則中國當其衝，西則土耳其當其衝，中則印度當其衝。而細察俄之隱謀，則注意印度為尤甚。然果使印度折而入於俄，則中國與土耳其亦豈能一日高枕而臥？英之執政，知俄之覬覦印度也，早已密為之防。余竊聞俄皇之論，亦頗躊躇審顧，不欲輕動。其用意在於綏撫其民人，輯和其部族，墾闢其荒地，聯絡其邦交。沈幾觀變，引而不發，固有虎豹在山之威。然後以其全力生聚教訓，積至數十百年之後，地廣人眾，勢力且十倍英、德諸國，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昔者戰國之初，六國合力攢秦。而秦乃閉關息民，養精蓄銳者數世。迨開關出師，六國皆從風而靡，莫之能敵。俄之機勢，大與秦類。蓋積之愈厚，則基愈固，蓄之愈久，則勢愈雄。今日者，俄如多事，固天下之患也；俄竟息事，尤俄國之利也。然則中西各國將若之何？曰盡其自治自強之道而已矣。若俄之所以自謀，則非他國所能與聞也。」

決吏，並且出使異域。乘使職之便，宜有所見，並有所悟。然在野人士之研斷識慮，亦然無遜於薛氏。若王韜之避罪天南，流寓香港，窮蹙孤立，畢生不仕。而其觀測世界大局詳密深入，洞徹表裏，探討歐洲列強，推斷未來動向，皆如預見。⁴⁸足見當時國人之留心世變，謀國家適應之方，殆為朝野清醒之士所承擔之普遍使命。

四、對等國際觀念與均勢思想

中國現時遭遇之世界環境，為列強競逐之戰場，其爭殺之慘烈，陰謀之險狠，前史所未聞。而稍可引為參考之資者，則春秋戰國數百年間之爭強圖霸，併滅弱小，足備一具體史鑑。展望未來，尤可自強秦翦滅六國獲取教訓。雖舉世尚在紛爭，難料鹿死誰手。然俄國之因勢乘便，蠶食鄰封，增添軍艦，急謀出海，殆已具備氣吞寰宇之勢。中國三面接壤，邊地屢遭侵蝕，承受敵害，首當其衝。當時醒覺之士，無不引為隱憂。於國家之適應世變，靡不呼籲改轍易途，主張面對當前危局。急求妥善對策。

48 王韜著《法國志畧》，卷十三，第十七至十八頁。『泰西諸國俄為大，拓地三洲，控弦百萬，且又形勢據乎上游。長駕遠馭，力自有餘。顧其疆輿雖廣，而國中多平原曠野，四境之內，別無海疆險要隘口，足資控扼以往來。故其兵長於陸戰而短於水攻。勢不能越重瀛而兼併人國。是其幸不為歐洲列國患者，以有土耳其一國為之蔽也。然土自來武備久弛，國體不振，君多柔闊，民習惰偷，與俄強弱之勢亦已形見。俄之睥睨其旁，蓋已匪伊朝夕。其欲割裂土疆，廣自封植，不獨蓄之於心，亦已形之於事。茲之有是舉也，豈真欲修夙怨，報深仇，張公憤，因教事而行撻伐。不過藉以啓釁興戎，快其吞噬。其意謂此蕞爾國，翦滅之而朝食亦復何難，設使土入於俄，則全据多惱河為其襟帶，馬木拉海在其東，地中海在其南，亞得亞海在其西，黑海出其中間，地形便利，八達四通。自此蓄練水師，修治戰艦，順流直下，隨處可攻。希、瑞、西、葡諸小國，無難鞭箠臨之矣。羅馬一統之盛勢，將復見於今日，此歐洲列國所深懼而切慮者也。是以法、英二國不得不力為維持之，為土實以自為也。土一國存亡之機，即歐洲列國盛衰所繫。列國中國富兵強以法、英為巨擘，其力足與俄抗，是以援土之舉，推為盟主。外此各邦，非不欲扶弱鋤強，或恐力有未逮。故但秣馬厲兵，選鋒養銳，外有備以待強敵，內有守以固疆圉而已。夫能聯國以制一國者，此固小國之利也。知此道者可不亡。且俄之欲取土也，未嘗不忌法、英之議其後也。先是俄主致書於英女王曰：土衰已甚，刑政不修，若病膏肓，奄然待盡，疆宇兼圻，誰其主者。竊聞取亂侮亡，兼弱攻昧，古之善經也，滅國分疆，宜在今日。某地歸英，某地歸俄，共享厥利，時哉勿失。此蓋以香餌餌英也。當時英女王覆書經之曰：彼兄弟之國，果其孱弱不克自振，凡屬鄰好，皆應助援，不宜起侵凌之心，思有其地。俄知其術不售，遂有攻土之役。其卒敗於英、法者，天也。蓋天猶未欲歐洲列國之蠶食於俄也，自是歐洲雄國，英、法、俄鼎峙而為三。』

又，王韜著《俄國文錄外編》，卷十，第九頁：

「方今俄與英、法、普、澳爭雄歐土，猶戰國七雄以合縱連衡為事也。俄國於極北據形勝之地，窺各國之嚮。猶秦阻嶠函以臨六國也。英、法、普、澳富國修政，練兵養銳，而環視俄遠巡不敢犯之者，猶趙楚稱雄六國，而不西向窺秦也。英、法講交四方，通互市，要盟約者，六國之合從也。俄之開疆土，張國威，坐令鄰近折服者，則秦之連衡也。而秦之所以能併六國者，則在取巴蜀而據其資也。巴蜀未併，則國力不張，秦未可東兵也。今俄之蠶食亞細亞東北，亦殆秦之取巴蜀而據其資者矣。俄往年攻土耳其，為英、法所扼，無功而止。於是其意謂與其爭歐，不如爭亞，蓋爭歐難而爭亞易。俄既東向併亞細亞諸國，而後拊背搯吭，以薄英、法，則其志可逞也。其經畧亞西亞東北，遣使論日本北疆，畧堪察加佐甲廉，其成算可知也。近聞自佐甲廉至俾得堡，七千里間，通馬車道。又以美洲所轄之地，羈於合眾，而以所得數百萬金充開拓東北之費，乘此勢駸駸以南，則安知異日不以東北全力薄英、法，濟其所大欲，如秦統一六國乎？」

適應列強紛爭之世界，根本之策，當從看清所處環境並認識西方列強本質入手。十九世紀，固乃一強權世界，國人已畧知其有強權而無公理。對於西方列強之用心，嚴復早有揭示，以警惕後人：

今夫各國，歲糜萬萬，張海軍而治陸師者，大抵欲自為其無道，而禁人之無道耳。司李之官，歲祿最厚，督工之俸，優於執功。凡此皆民德之不可恃，而侵欺者繁致之也。使其不然，則省之以厚民生者，豈不鉅乎。雖然，兵刑官師之必不可廢。固也。而必立為之制，於國之四民，賤其三而貴其一，使一國之聰明才力不爭出於生利養民之農工商，而皆出於耗財治民之士大夫，而又雜冗而不精，濫多而無用。使前言而信，其國之日趨於貧弱且亂，非其所歎。且夫兵廣不精，其害尤烈，此學操兵而業殺人者，固皆操耒耜而業食人者也。一云募兵，則使生者益寡，食者益衆，已甚病矣。然猶曰此所以衛生民而保積聚者也。而今日之兵，其衛生民保積聚，又何如乎？時平則糜糧餉，臨事則乏軍興，事後又有兵費之賠償，哀哀下民，遘此天罰。竊以為國之額兵，宜居小數，蓋今日軍旅之事，難在訓將，不在練兵。誠使軍制齊均，將由學問，則臨事之時，固可化一以為十也，使其不然，多乃益弊，一挫之餘，不可收拾，徒竭國力，復何益乎。⁴⁹

薛福成急切呼籲中國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於勤遠畧一義，不憚再三申論：

《春秋左氏傳》，譏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其病全在不務德三字，惟不務德，所以雖為五霸首，而不能進乎王道。並非遠畧之不當勤也。後之不善讀書者，將上半句意義抹殺，若謂不勤遠畧，即係務德之明證，此大不然。近世時文家，更拈此四字為王霸題目話頭。而由考墨卷出身之士，寢假而秉國鈞，遂以此說施之政事，不知其他。當昔全盛之時，尚可敷衍無事，一值多事之秋，則顛覆立見矣。蓋中國素有不勤遠畧之名，外洋各國知之甚審，莫不欲奪我所不爭，乘我所不備。眚瑕伺隙，事端遂百出而不窮。夫惟不勤遠畧，是故琉球滅而越南隨之，越南削而緬甸又隨之。其北則布哈爾、布魯特、哈薩克諸回部，盡為俄羅斯所吞併。而哲孟雄，什克南，廓爾喀諸部，則皆服屬於英。即朝鮮之近在肘腋者，亦有岌岌可慮之勢。夫惟不勤遠畧，是故香港、西貢、小呂宋、噶羅巴等處，各有數十萬之華民，而不能設一領事。美屬之舊金山，英屬之新金山，華民皆有自關之利源，而無端失之，反受他人驅逐。夫惟不勤遠畧，是故商務則無一船越新嘉坡而西，越小呂宋而南者。而兵船之遊歷亦不逾此。出使大臣或懵然於條約之利病，而不知久遠之計。封疆大吏或惘然於邊防之得失，而惟偷旦夕之安。凡此皆由

49 嚴復譯《原富》，第三四〇頁。

學術之誤，以誤國家誤蒼生也。嗚呼！安得徧聒當軸諸公而與之一講經義也。⁵⁰

鄭觀應則謂中國四面受敵，已處於列強包圍之中：

今英、法、俄三國，爭造鐵路，以通中國，包中國之三面，合之海疆，已成四面受敵之勢矣。英由印度造一路，逾克什彌爾，北抵廓爾喀，分支至西藏之大吉嶺，與藏地為鄰。一路由緬甸之仰江以達阿瓦，逕距滇邊。法由越南造鐵路以通雲南、廣西。俄自東北彼得羅堡至西北西伯里亞一帶之地，凡造鐵路一萬餘里，循黑龍江而南。告成而後，商賈往來便捷，愚民無知，惟利是從，我能保護之則百姓我之百姓也。我不能保護而人能保護之，則百姓即為人之百姓。緬甸之屬英，越南之屬法，琉球之屬日本，吉林東北各部之屬俄，其明證矣。且口外荒地甚多，開墾甚便，一有鐵路，內地無業之民，相率而至。膏腴日闢，邊備日充，商旅日集，大利所在，人爭趨之。荒遠遼濶之區，一變而為商賈輻輳之地。而我之境內未有鐵路，則荒涼者如故，貧瘠者如故也。彼此相較，貧富相形，而欲邊境之民盡甘槁餓而不為敵人用也，其可得哉？若彼以一旅之師，長驅直入，則邊陲千里，闕其無人，蹙地喪師，可以立待。故敵無鐵路我固不必喜新好異，為天下先，若人皆有鐵路，而我獨無，則必敗之道，必不能支之勢也。⁵¹

世局險惡，中國岌岌可危，當如何以適應之。劉善涵則謂本之情與法以應世界各色人等：

⁵⁰ 薛福成著《出使日記續刻》，卷四，第八一至八二頁。

又，薛福成著《出使奏疏》，卷下，第十五至十六頁：「臣竊維數十年來，西洋諸國，競知中國幅員遼闊，又有不爭遠土之名。一遇界務，鮮不為眈眈之視，若可聽其蠶食者。於是琉球、越南、緬甸以藩屬而見吞。香港、瓊春、海參崴以邊隅而被攘。甚至有覬及朝鮮議及台濟者。中國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開疆生事之嫌，得之則曰猶獲石田，失之則曰不勤遠畧。顧石田棄而陝壤危矣，遠畧弛而近憂迫矣。我視為荒土而讓之，彼一經營則荒土化為奧區，以奪我利柄。我見為甌脫而忽之，彼一布置，則甌脫變為重鎮，以逼我巖疆。伺閒蹈瑕，永無底止。歲竣月削，後患何窮。臣愚以為，必擇一二事以全力爭持，然後可以折狡謀而挽積習。此次滇緬界務，憑藉皇上寵靈，始變前規，稍展舊界。實維總理衙門之功，總理衙門統籌全局，假臣事權，始終扶助，謀議相同。每有查詢，朝電夕報。俾臣得遠承指揮，稍殫愚拙。雖獲地無多，而裨益有五：風示各國，俾勿覬視，一也。隱備印度，杜其窺伺，二也。保護土司，免受誘脅，三也。捍衛滇邊，防彼勘進，四也。援用公法，稍獲明效，五也。」

又，薛福成著《庸庵海外文編》，卷三，第六十至六十一頁，《答友人書》：「自古竭誠謀國，奮身籌邊，如唐之裴、李，宋之韓、富，當時忌者，皆有違言。或以好名斥之，或以貪功疑之。執此二說以撓君子，天下乃無一事可為，祇有引身退耳。僕於古人，不敢希望萬一，權位亦更非其倫。若果處優自便，以不忠為忠，見置事之敗壞，袖手推諉，處樽俎折衝之任，緘默不言。敷衍塞責，如世之庸庸者之所為。轉可免悔吝而消讒忌，安行並進，未嘗不弋高官而養後福。然如此以得後福，不如無厚福之愈也。足下若責僕以訐諷未周，爭論不力，安邊禦侮之效未符初志，則僕知懼矣。若勸僕以輕美巧滑，玩敵誤國，則非不才之所敢聞。方今時勢，正如賈子所云：「厲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尚惴然自以為安。僕馳驅海外，熟觀情勢，輒思殫綿力以補救一二。平日明義理，而又深知我如足下，乃亦不能相諒。若此空感嘆我者之言邪，抑泊於時俗之見也。」

⁵¹ 鄭觀應著《盛世危言正續編》，卷五，第六頁。

王爾敏 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國十數，君長百數，人恆河沙數，此亦至不齊之道也。至不齊而思有以齊之，則約有二端：一曰情，一曰法。天下無情外之法，即無法外之情，並無情法外之人之國。情與法二者恆相資。教無論東西儒釋，族不判白黃黑赤，蓋合大地萬國無遁之者也。人性皆同，自然者情也，當然者法也。法與情遇，而後伸理之權出焉。 52

薛福成主張，國際情景萬變，若能知己知彼，仍能操縱其間，趨利避害：

英人通商，法人傳教，已徧通內地。交涉紛競，視他國為甚。其分屬英、法之緬甸、越南，尤逼吾南服，我不能閉拒阻遏也。夫人而知之矣，知之而不圖所安，非所謂狃於積習粉飾自欺者歟。大抵今古之事百變，應之者無有窮時，平天下者平其心以契矩天下，知我之短，知人之長，盡心於交際之間，往者荷蘭、英吉利屢以商困人國，法蘭西、俄羅斯則常以教侵人國，然亦有效有无效，何也？禦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縱之權，固在我不在彼也。 53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揚州教案之交涉，適美國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代表中國報聘至英，以情理折英人，責其勿動輒用兵船威脅。終以和平解決。志剛叙其交涉經過，不外運用西方共通之人情法理而已：

憶自英國與蒲使會辦交涉，適值揚州滋事，英官擅調兵船，幾激大事。乃預籌辦法：謂中外交涉，最難解說，無如動輒恃強，以兵船為辦事之具，若時常動兵，必誤商政。實兩不相宜之道。蓋西國以通商為正務，以兵船為輔助，因兵誤商，非其本意。經蒲使從中多方開道，始得其外部公文譯出，詳譯其意，雖云不欲勉強，究竟仍思進益。乃尋出推重中國總理衙門之權，因以解各省英官之擅。其用心於中國為緩手，於英國則為扼要。惟其文後有論在中國之洋人，遵守中國律例，與百姓輿情相洽之語，頗為近理。實西國通行之公法。即可執此以平洋人之心矣。 54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有漏稅洋船為鎮江關查獲，該船事後更換船名，並變易船主。抗拒中國海關的驅逐，而英使強力支持該船之違法行動。交涉至於總理衙門，爭執不決，曉舌不已。適總置署大臣董恂出面，以情理反詢海關則例如何執行，英商理屈，

52 《沅湘通藝錄》，卷三，第五九頁。

53 薛福成著《出使四國日記序》。

54 宜壘（志剛）著《初使泰西記》，第十八頁。

終於服從結案。⁵⁵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因雲南邊地殺害英國書記官馬加理（Augustus R. Margary）引起中英交涉，李鴻章致書雲南布政使潘鼎新，告以引用《萬國公法》，應付對英交涉。

將來威使（威妥瑪 Thomas F. Wade）派員到滇時，應查明《公法》書內第四卷所云：調兵不能行於局外之地，各國和好時，固可有權索路，惟不得強為通行。局外者或准或禁，皆可任意等語。中華自主之國，豈容他國無故調兵入境。如未商准，則軍民勢難甘服。⁵⁶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美國派遣議員布雷爾為駐華公使，因其一向在國會主張排斥華工入美，對華實不友善。中國政府不願接受此一使節，拒其來華，雖已行至中途，亦奉命折返華盛頓，此蓋中國有權迎拒，並能作此決定。⁵⁷

十九世紀知識分子對於國際關係一項重大的了解，在於認識到歐洲列強間所流行的均勢思想。這是中國置身於萬國競逐的世界中所應具備的基礎知識。對於適應世局的變化，較易於了解關鍵所在，以進而採取對策。最早提出此項認識者是同治十年（一八七一）王韜的意見：

當今之時，處今之勢，普當持歐洲不變之局，與諸國相安於無事。然後可以長握其權，恆蒙其益。其道當奈何？曰收壤以為輔，合英以自固，進可以拒敵，退可

55 董恂著《選讀我書室老人年譜》（光緒間家刻本），第二卷，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是年鎮江關查獲漏稅洋船，更名易主，不遵驅逐一案。紛囂不已，愈執愈堅。於其卒也，恂袖出一紙授之，笑謂之曰：何必爾，閱此自明，畧視即携去。已而文文忠來署，問前件今何如矣。曰：結矣，氣奪語塞矣。乃檢原稿請補閱，并署其端曰：商船犯章問。內言商船走私，有犯約中嚴行驅除，不准在口貿易之章者。驅商耶？驅船耶？認商耶？認船耶？若以為認商不認船，如商人趙甲有日字月字兩船，均是此商之船，內只日字船在此口犯章，將僅驅此商之日字船耶？抑因月字船亦屬犯章之商遂并驅之耶？設如趙甲日字船犯章後售與錢乙，而趙甲別置一星字船，將來日字船抵口欲驅之不可能也，日字船犯章，錢乙未犯章也。星字船抵口欲驅之不能也，趙甲犯章，星字船未犯章也。請問當驅何商？當驅何船？驅除之約不將虛設耶！既云認商不認船，趙甲犯章，其日字船既以易主而不可驅，將轉而驅其未易主之月字船耶？設本無此月字船，將誰驅耶？日字船既以出售而不可驅，將改而驅其新置之星字船耶？設未置此星字船，將誰驅耶？沉月字船、星字船必不受驅耶？驅除之約，不又虛設耶！又如孫丙有天字船犯章，李丁有地字船犯章，周戊人字船不犯章，吳己物字船不犯章。孫李互易其船，如欲驅之，必曰商雖犯章之商，而商之犯章非此船也。船雖犯章之船，而當其犯章之時，我尚未為此船主也。其將誰驅耶？又不然，孫與周互易其船，李與吳互易其船，是各以犯商，據不犯章之船，而各犯章之船，各以不犯章之商庇之，其又將誰驅耶？驅除之約，不更虛設耶！請問高明必如何而後此約為不虛設。文忠讀而善之。自是，彼此來往絕口不言，而本關已按約辦理矣。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其道如此。」

56 《李鴻章致潘鼎新書札》（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印），第九三頁。

57 薛福成著《出使日記續刻》卷一，第十四頁：「美國新簡駐華公使議紳布雷爾，常在議院持禁止華人到美之論。美政府已接中國照會，不願接布君為駐華公使。行至舊金山，外部電令速回華盛頓。政府並無驚訝之意者，蓋以中國如不願接他國派來使臣，自有此權利也。」

以保邦。聯弱小以制強大，均勢力以靖兵戎。無創遠交近攻之謀，無貪拓土開疆之利。尤要者，則在親俄防俄，而勿使之東，如是歐洲可以長享太平，而普亦恆得其強矣。⁵⁸

而所論最完善，並洞悉歐洲列邦大勢，直援西方均勢思想之淵源背景者，則為光緒四年（一八七八）馬建忠的意見：

夫均勢之說，創於范斯法尼(Westphalia)之會，然而與會者不過法、奧、瑞典、西班牙暨日耳曼之屬。而普因北教而屏，英以異教而斥，故其相維之勢足以聯絡數國，不足以統屬歐洲也。至迂特來(Utrecht)之會，英、普與焉，而俄國不與，是均勢之盟未盡普也。且范斯法尼之會諸國雖共訂條章，而西班牙與荷蘭乃有孟斯德(Münster)之約，日耳曼王率屬邦先與瑞典有奧斯勃盧克(Osnabrück)之約，繼與法國復有孟斯德之約，法國與西班牙又有比來納山(Pyrenees Mt.)之約，前後紛紜，而統謂之范斯法尼之約。又迂特來之會，英人先與法王盟，繼與西班牙王盟，復與他國王分盟。然則是二會者，祇屬數國之私盟，而非列邦之公約。夫會者所以結同盟之信，盟之者衆，則信益彰，而守愈篤。今此二會，散漫無紀，不能共相維持，宜其不久而各國弁髦之也。維也納之會，則不然，俄國與約而均勢之道公，友邦共盟而要結之誼固。⁵⁹

鄭觀應亦就西方情勢，而主張國際間以法維繫：

夫各國之權利，無論為君主，為民主，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奪。良以性法中決無可以奪人之理。故有均勢之法，有互相保護之法，國無大小，非法不立。⁶⁰

陳虬並言歐洲均勢之局：

按萬國公法，歐羅巴大洲內，倘國勢失平，諸國即警懼張惶。且必協力壓強護弱，保其均勢之法。蓋一國強盛過分，恐其有不遵公法而貽患於鄰國也。⁶¹

中國認識列強均勢形勢，於國際爭持餘隙，尚可因利乘便圖謀富強。此正進取均勢思想而妥善運用於國際關係中之要圖，實較坐困一隅，承受外力衝擊為善。薛福成指出

58 王韜著《普法戰紀》，前序（同治十一年刊）。

59 馬建忠著《適可齋紀言》，卷二，第十一—十一頁。

又，同前書：「夫歐洲列國，壤地毘連，雖一境之文治、武功由我獨斷，然保無有狡焉思啓者，乘間抵隙以爲與國虞。於是諸列國申盟要言，以強弱相恤，大小相維，成一均勢之局。即戰國合縱連橫之說，名異而事同也。而歐洲自勝朝之末，以迄於今，交涉之道，專主於此。」

60 鄭觀應著《盛世危言》卷四，第八頁。

61 陳虬著《經世博議》（光緒十八年刊），卷四，第七頁。

歐洲均勢已成，列國莫敢先發。此正中國乘機自強之時，當以把握為要：

吾聞管子之言曰：善射者厄於野，善游者厄於梁。凡國之亡亡於所長。然則天下之善知人長者，又即善於知人之短者哉。海外之國，崛起者五六。虎視而鷹睨，殆未有所定。或者形格勢禁，憚於發難，先動者得禍，故莫敢妄舉邪。孟子曰：「及是時，明其政刑，誰敢侮予。」福成以為時不可失者，無有切於今日者矣。⁶²

列國外示和睦，內懷猜忌，整軍經武，伺機待時。相持之下，無人敢據為戎首。此即據均勢觀念從而認清當前國際關係，項藻馨即作此論斷：

縱觀大局，雖壇坫會盟，各守萬國公法。而禍機之伏，固結愈深。咸萌乘機竊發之心。然而目前尚無事者，非力或有所不足，而勢實有所不能也。奚以知其然也，蓋俄、英、法諸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發也。⁶³

近世討論清季對外態度，除譏議中國中心與天朝意象等觀念之外，而有一當時習慣引用之觀念，所謂以夷制夷政策，恆為後之史家所詬病。迄於民國以來，殆亦視為自大與狂妄。立於萬國薈萃之世界，本不當以夷狄待異邦。且當十九世紀，列強環伺，中國岌岌可危，究有何等能力操縱列強，使之彼此相制。蓋空逞舊說，何嘗夢嚙；既不度德又不量力，抑且不見當前國勢之阡危，豈非麻木盲目？凡此論斷，當亦事實所見，理有固然。數十年來，已成定說。

細釋以夷制夷之沿習應用，實不可單就字面一層作了解。其一，就歷史淵源以觀，則在兩漢時代已成為中國策士與政治領袖經長期討論與施行之對外政策。所謀減輕北方匈奴壓力，有兩項政策輾轉配合應用。一在對匈奴之和親通好。一在結好西域諸邦，以免遭受兩面夾攻。其二，配合長期國策，以夷制夷之法，主要在圖中國自保與安定，而並非進取擴張。故而運用恆久，中外可見；抑且並非一時之戰畧，尤非專恃武力。其三，「以夷制夷」一詞，可視作古來名義之傳承。故夷字須具廣泛解釋。用於近代，實可泛指外邦列強。主要在認識此種政策之真實意義與價值。蓋自西方均勢思想發達，其巧妙設計，婉轉施用，無論何時何地，全不出以夷制夷之一途。今日國際情勢，尤其變幻譎詭，巧黠難測。而追根究底，實仍不過均勢思想為宗旨，以夷制夷為手段而已。

中國近代，自鴉片戰爭以至戰後，以夷制夷之論甚囂塵上。當時阮元、魏源、林則徐、札拉芬泰等人紛紛建言以夷制夷之法，上沿舊說，下開近代。及中英訂約，五口開埠，當時耆英、伊里布主持外交，多拒採用。⁶⁴

嗣後此說未斷，若咸同之際夏燮所謂：

62 薛福成著《出使四國日記序》。

63 《格致書院課藝》，壬辰卷上，第二十頁。

64 王爾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一七九——一八〇頁，二〇五——二〇六頁。

《傳》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蓋以夷制夷，其道在近交而遠攻。故兩漢之西域常通，而匈奴之右臂以斷。⁶⁵

後之李鴻章，並據西方強國普、法、英、俄而為言：

法、布交兵未息，英、俄又生猜衅，以敵攻敵，此數強大並處常態。得人控馭，必無他虞。⁶⁶

惟十九世紀中國官紳之提論以夷制夷政策，無論倡說宗旨與施行設計，充其量不過在開放中國商利，使各國互相爭趨互相牽制而已。只有李鴻章較為應用於中外交際之中，雖慣施此技，然亦未必有重大效益。若就謀國者趨利避害之權衡，處於列強並峙之間，若尚未能力求自強，實不能不在國際政治上利用列強間隙，於緩衝地帶謀求存立。最明顯的例證，為光緒五年（一八七九）李鴻章勸使朝鮮與西洋各國立約通商，自當為李氏以夷制夷政策之實踐：

為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為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固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西人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統與西人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去歲土耳其為俄所伐，勢幾岌岌，迨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歛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矣。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強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握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等處，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逼，若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人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⁶⁷

就萬邦林立之世局，與強鄰周旋，固然無力左右諸大國均勢形勢，則可就相同利害，要結外援，聯絡與國，突破包圍困境。此正承受均勢思想之下必然思考之出路，是即自然誘導出聯合友邦觀念。抑且就近代以夷制夷觀念之自然發展，同時亦必走上聯合政策一途。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李鴻章即已示意朝鮮，要結與國：

昔蜀先主猱亭之敗，怨吳甚深，而諸葛武侯生平措注以和吳伐魏為上策。唐德宗

65 夏燮著《中西紀事》（同治四年刊），卷一，第十九頁。

66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光緒三十一年金陵刻本，民國十年，商務景印），卷十，第三五頁。

67 李鴻章著《李文忠公遺集》卷五，第十八—二十頁，《三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有宿憾於回紇，李鄴侯勸以釋忿尋盟，而土蕃之勢頓衰。蓋命世英雄，錫細故而擴遠圖，往往如此。邇聞俄國與土耳其和議已成，西事方戢，將圖東畧。執事老於謀國，徹桑迨陰之計，其在斯時乎。僕以東土屏障中原，又千里神交，氣誼相孚，不得不一據肺腑之談。近今貴國廟謨若何？鄰交若何？固未能知其詳也。⁶⁸

馬建忠尤據歐洲列國大勢，分析重視邦交的重要，說明聯合政策的意義：

蓋天下事衆擊則易舉，孤掌則難鳴，理之常也。夫同宅寰中，此疆彼界，而建爲國，則必小事大，大字小，憂危與共，戰守相援，而勢乃不孤。故英得法助，奏績於黑海之濱。意與法連，逞志於綠植之上。比利斯交權於英法，自成局外之邦。合衆國求助於法王，得行自主之政。此皆邦交之實有所援也。或恐鄰國之袒我仇而因與之交者亦有之，如普之攻澳也，結法人而餌之利，則嗅獨而危。及其攻法也，善俄國而申之盟，則法孤而敗。自均勢之局定，而列國安危所繫，莫大於邦交。第交不可無，而擇亦宜慎。英人之交，惟利是圖，利在則友，利亡則寇。列國之結權於英者，大抵無實德之可圖，祇求其不助之助耳。嘗慨今之不善交者莫土人若，見俄國之日強，故附之，而俄已三削其地矣。見法人之喜功，故親之，而法已兩奪其權矣。又見英人之已護也，故私之，而英幾半分其國矣。嗟夫，當回人之滅東羅瑪也，闢疆展土，歐西爲之重足而立，所來使臣，動加鞭笞，而莫敢誰何。今則時窮勢迫，國內之政教財賦反爲外人牽掣，民貧國蹙，僻守一隅，幾於國不其國者何也，處遞變之時，不因時而與之俱變。內無定向，而知變之士窮；外無友邦，而應變之方少。徒守此千百年前瑪奧買所著《伊朗》一書，欲以應夫千百年後世道之變，無惑乎日就削亡，徒爲天下後世多一泥古不通今之龜鑑，可不惜哉。⁶⁹

以貧弱之國而應付強權世局，則聯絡與國，要結盟邦，自爲必要可循之途。然則何國當防？何國當依？何國聲氣可通？何國緩急可恃？自然必須進而審思，詳慎選擇。於是使結盟政策自具一定之目標。薛福成選擇美國，分析國勢利害，以爲可作盟友：

洋人之至我中國，專恃合從連橫。而我以孤立無助，受其箝制。含忍至今，誠欲於無事之時，多樹外援。則擇交不可不慎也。方今有約之國，以英、法、俄、美、德五國爲最強。五國之中，英人險譎，法人慄悍，所至之地，便思窺伺罅隙，隱圖佔踞。此中國之深仇，不可忘也。俄國地廣兵強，爲歐洲諸國所忌，今且西守伊犁，東割黑龍江以北，據最勝之地，以扼我後路。是宜羅設大防以爲藩籬。而尤注意於東省，嚴爲之備，而婉與之和，此中國之強敵，不可忽也。美國

68 同前書，第十六頁，《再答朝鮮相國李裕元書》。

69 馬建忠著《適可齋紀言》，卷二，第十三—十四頁。

自爲一洲，風氣渾樸，與中國最無嫌隙，其紐約與蒲公使所立新約，則明示以助我中國之意。蓋亦恐中國稍弱，則歐洲日強，還爲彼國之害也。故中國與美國宜推誠相與，畧棄小嫌，此中國之強援，不可失也。德人新破法國，日長炎炎，幾與俄、英鼎峙，幸其通商之船尚少，則交涉之事亦無多，此亦中國他日之強敵，不可恃爲援，亦未至驟爲患也。⁷⁰

鄭觀應亦主張聯美：

昔諸葛之治蜀也，欲討魏必先和吳。蓋必有心膂之交，乃不受腹背之敵，老謀深算，動出萬全。今洋人恃勢縱橫，觀釁而動。我國受其挾制，孤立無援，更宜圖之於早也。查立約諸國，最強者莫如英，而美、法與俄皆堪頹頹。然英人險詐，法人鷲猛，勢力相敵，迹其離合，實係安危。俄則地據形勝，兵嚴紀律，惟以開疆拓土爲心，向爲諸國所忌，而尤爲中華之所患。宜外與聯合，內嚴防守，不可或忽也。美國秉信守禮，風俗龐厚，與中國素無猜嫌，當相與推誠布公，立敦和好，有聲則稍資臂助，無聲亦遙藉聲援。若日本則器小易盈，夜郎自大，中國仍當嚴備。設重兵於沿海，以杜其機心，駐欽使於藩邦，以通其聲氣。如有蔑法背約等事，則遣使責之以理，使其有所懾伏，不敢肆行，守在四夷，道不外於此矣。⁷¹

此外則張煥綸主張聯英，其論尙足服人。而曾紀澤主張聯日，則不免輕估日本野心王韜亦主張聯英，惟深知其實不可恃：⁷²

英人果能力顧歐、亞洲大局，與中國併力合謀，則因時制宜之策莫善於此。蓋中、英合而敵勢孤，俄必有所懾而不敢肆；中、英分而敵勢橫，中、英兩有所損而難以圖功。說亦未可徧駁。英人意見之同否，則要領全在星使，固非外人所可臆度也。⁷³

楊毓輝主張並聯英、日，以保東方大局，不知日本駸駸謀華之志正酣，無異與虎謀皮：

爲今之計，亦師彼之法制彼之長而已。其法奈何？曰德、奧、義之所患者，俄、法也，合縱行則非惟俄無足患，即法亦無足患。俄、法之所患者，德、奧、義

70 薛福成著《庸庵文編》，卷一，第二十頁。

71 鄭觀應著《易言》（光緒二十一年時務叢鈔本），卷中，第十三頁。

72 王爾敏著《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二〇七至二〇八頁。

73 《格致書院課藝》，庚寅卷下，第三十七頁，〈王韜眉批〉。

又，同前書，辛卯卷上，第六頁，王韜課批：「英之患俄，較我國雖稍緩，然我於此時即欲聯英以制俄，恐未能也。須知俄爲諸國之所忌，英亦何獨不然？自失法助，英勢已孤，所幸尙知持盈保泰耳。德於東方成中立之勢，即我欲結之，亦未必可恃。」

也。連衡行，則非惟德無足患，即奧、義亦無足患。是結援者，固保邦致治之謨也。誠使中國率同朝鮮與日本、英吉利互相聯絡，同謀合力，禦侮折衝，則他國亦不敢逞，而太平之局不將長此終古也哉。⁷⁴

項藻馨則主張廣結歐、美外援，當不免寬泛無所宗旨，或未能權衡國際利害關係，乃至中國自身之遭際。然亦顯示聯合與國之意義：

首宜交德，次宜交美，以及瑞、丹、普、日、和、比、義、奧諸小國，皆宜聯絡輸誠，結以信義。非必藉外援。而荷戈執戈供我驅策，第使之不爲人助，即不啻爲我助，以彼制彼，所謂以毒攻毒也。雖各國宜交而俄與英、法不必交乎，而非也。彼以和來，我以戰往不可也，孤立無援，與生衅同，亦不可也。是宜防患於未然，弭變於無形，可以信孚者以信孚之。可以術馭者以術馭之。內峻其防，外弭其隙。雖有敵國外患，自無慮矣。吾故曰：莫要於聯與國。⁷⁵

至聯俄主張者，早期者有薛煥。而甲午中、日戰後，主政者多主聯俄，李鴻章固見諸行動，而張之洞亦並有此類建議：

再今日救急要策，尤莫如立密約以結強援之一端。從古各國角立之時，大率皆用遠交近攻之道，而於今日中、倭情勢爲尤切。今日中國之力，斷不能兼與東西洋各國相抗。此時事機甚緊，變故甚多，即日夜汲汲征繕經營，仍恐不及。若又急謀一紓禍之方，恐無喘息自強之暇。查外洋各國風氣，於各國泛交之中，必別有獨加親厚之一二國，平日豫訂密約，有戰事時，凡兵餉軍火，可以互相援助，若無密約者，有事便守局外，不肯干預。今欲立約結援，自惟有俄國最便。緣英以商賈中國之利，法以教誘中國之民，德不與我接壤，美不肯與人兵事，皆難議此。查俄與中國乃二百餘年盟聘鄰邦，從未開衅，本與他國之屢次搆兵者不同，且其舉動闊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⁷⁶

中國處於列強並峙之世局，既已覺悟其均勢形勢，且於適應之方，思考聯合與結盟政策，自是重大進展。而若深究歐洲全面國際關係制度，分裂形勢，終無統紀，爭殺不已，誰爲制衡。抑且公法條文雖日見詳密，徒見強國之藉勢凌人，又有誰人執公法而約束其後。聯合結盟，尤競勝爭雄，互相對壘，實力以爲維繫，強權即是公理。何能得天下之平。中國敏覺之士，審思孰慮，推演而創國際仲裁組織之建議，早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陳虬已主張聯合五洲萬國，選定印度或朝鮮，設立大公法會，用以執行公

74 同前書，壬辰卷上，第三十頁。

75 同前書，第二四頁。

76 張之洞著《張文襄公全集·奏議》（民國二十六年，北平，楚學精舍藏板），卷三七，第三六至二七頁。

法，裁定世界之公平是非：

虬嘗議：聯五洲設一大公法會於五印度，主持公法，取其地居東半球之中也。若准以《易》理，朝鮮其次也。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原註：《易》：明夷稱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而陳疇演範，獨受朝鮮之封，必非無意。〕三十年後，上雖用事，明夷之九三將起而應之，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吾說或亦將有所施乎。⁷⁷

中國當積貧積弱之勢，處於列強環伺在華競逐特權之時，竟能據全球大局，判斷世界前途，關心萬國安危，最早提出國際仲裁組織，實具有包容天下心胸，洞察世勢現光。而固有知識傳統中天下觀念之習染，當為這種動機的根源。至於中國適應國際現勢，知識分子努力於認識西方，謀求種種對策，其思想觀念，貫串古今中外，浸濡而融會，終於並達到現代中西觀念之滙通，遂即自然提出統一性之世界仲裁組織。展望未來，此一課題，正大高遠，且將為二十世紀國際政治家共同努力目標，其發展遠景，實始見曙光而正方興未艾也。

五、結 論

中國自古以來維持國際和平，以求境內安定繁榮，其最高理想，形成所謂：「守在四夷」之原則。「守在四夷」之重要意義，即在於不貪邊功，不勤遠畧，不採取驢武遠征開拓疆宇政策。世常謂：竭中國以事四夷。中國向來引以為戒，並多為譏評好大喜功之君主。⁷⁸ 中國傳統國際觀念，重在和平相待，重在文化傳播，重在象徵意義，而絕不計較權利之重輕。漢朝對匈奴之和親與餽送重金，宋朝對遼、金年年納幣，全是有所捨，旨在維持和平而有取於長治久安。故在鴉片戰後之議訂《江寧條約》，時人權衡利害，並以漢世輸金匈奴為言。志在息兵安定，不望屢年干戈擾攘也。⁷⁹

至於中國自古形成對四裔邦族之宗藩觀念，實有歷久生成背景，雖不免自為國際中

⁷⁷ 陳虬著《經世博議》，卷四，第八頁。

又，陳虬之說，可能得自王韜介紹日本文士岡本監輔所議，見於王氏《法國志畧》原序云：「擇五大洲中要害數所，建立公法會。稱為天討府。鎮壓萬國，擬定條規十，令其遵行，期止兵亂。然其所言，同於向戌之弭兵，自非有大一統之主出，畏威懷德，必不能也。岡本監輔所論十策，乃書生迂談耳，不足當歐人一笑也。」

⁷⁸ 鹿澤長撰《瀛環志畧序》（道光二十八年）：「天下有道，守在四彝。王者不勤遠畧，而德意所涵濡，威靈所震懾，類皆有囊括區夏，甄鑄埏埴之勢。」故《禹貢》紀要荒，《周官》有職方氏之掌。東南置候，西北置尉。至於王母呈圖，鬼方效順，凡夫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九夷八蠻之國，如在幕庭。蓋自羲、軒以迄姬周之盛，鮮不由此。」

⁷⁹ 張喜著《撫夷日記》（民國廿五年，北平，文殿閣書莊），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九日記云：「黃大人（恩彤）曰：漢朝曾輸五千金與匈奴，所失者小，保全者大。如能善了，總比打破城池好。而此處一了，各處均安，你亦不要心裏難受。」

心，乃至天朝意象，殆亦循歷史發展而來，決非表面觀察所見之情景。其嚴重影響於近代對外態度以及外交適應能力，造成中國有史以來嚴酷之浩劫，此事確實應予檢討，使後世知所警惕。然無論如何研探，此種中國中心秩序，確曾長期維持國際間和平，在歷史上達成國際關係制度之功能。迄至近代與西方列強相遇，此種傳統觀念，無異自縛自獻，列強靡有不大得利益擴張特權者。

至於備受今世學者批評之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出於《詩經·小雅·北山》以形容封建周室。復經孟子加以引稱《孟子·萬章章》。既令後世帝王經常引為天朝意象之信條，實則終是一種信仰觀念。無論其生成背景與實質條件，與西方之殖民主義完全不同。中國帝王志在萬邦宗奉之虛名。而西方殖民主義在有土有民之實利。中國有史以來，未嘗於其任何藩屬曾有設重兵，置總督，抽入頭稅，搜刮財貨之事。其與殖民主義思想大相逕庭，實有天壤之別。

鴉片戰後，國人留心域外，眼界大開，多抒所見，頌美西方政教文化者日漸增廣，實無深閉固拒之意。蓋多出以理性觀念，理智態度。而就儒家傳統教訓，尤未嘗忘記誠信對人，施之於彼此邦交。然與陰狠殘忍貪婪無厭之西方政治家相遇，正以投其所好，而備受欺愚玩侮，喪失利權，並使國家陷於國際陰謀深淵。此類實例，更僕難數，我中外史家迄尚無人注意而加以檢討之。

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據古代戰國從衡捭闔之局，以會觀當世歐洲列強之紛爭，或以為迂濶而泥古，其實最易於認識國際現勢，易於連想而會通其情景。今日之國際關係，其間基本運用，原亦不外合從連衡，不過花樣尤新，牽掣尤多，陰謀尤深。現代學者雷海宗據春秋戰國合從連衡情勢，會觀二次世界大戰間之列強。鑑古知今。其所論斷，亦不出十九世紀官紳所見範圍。⁸⁰

回觀以西方為主流之國際制度，殆為今日全世界所必須遵循者。並向為西方學者所艷稱之對等國際關係。然就近世國際情勢以觀，其所謂對等者，所指誰何？除歐洲以外，亞洲，澳洲，非洲林林總總之世界邦國，何國會能享此對等國際關係？蓋近兩世紀以來，此種對等關係僅行於少數列強之間，即歐洲尚須有其例外。然即對等列強之間，亦俱深陷於猜嫌疑忌之中。各國競賽武備，以防一旦之決裂，以求一戰之勝利。此外更無妥善之方可循，爾虞我詐，絕無信持之具。對等國際之必然產物，並具充分之代表意義者，厥為條約。此亦史家所艷稱西方對等國際關係制度之特色。然則條約云者，徒為

80 雷海宗撰《古代中國的外交》，《社會科學》，三卷一期，民國三十年四月刊，第十二頁云：「六國中的明眼人，都知秦的野心漫無止境，非獨吞天下不可。但六國始終不能一心一德的合力抗秦，最後聽秦個個擊破，統一宇內。世事推移，好似有非人力所能挽回的趨勢。只看細節，歷史絕不重演。但從遠處大處着眼，歷史所能供給的教訓似乎又非常之多。印度的史料過度缺乏，可以不論。但羅馬的統一地中海世界與秦的統一中國，在政策的運用與步驟的進展上，往往如出一轍。今日的歐美，表面的態勢無論如何的獨特，骨子裏是否又在開始重演戰國的悲劇，這當然只有後來的人纔能斷定。但我們今日的人，若由此點觀察，對世界的大局與趨勢或者能有深入一層的了解。」

東縛弱國之枷鎖，中國近代百年備受其虐制。然則列強之間彼此又當如何維持？實則條約不足恃，盟書不足信，一切以現實利害為依歸。一旦失其需要，信約立可廢除，亦可化友為敵。條約之不可信恃，十九世紀中國官紳早已見之，王韜曾暢說其經緯：

秦西各國，犬牙相錯。千百年以來，皆以兵力相雄長。稍有齟齬，則鎗砲交轟，殺人如麻，曾不愛惜，近則託誠信以相孚，假禮義以相接。如向戌之弭兵，如蘇秦之約從。立為萬國公法，以相遵守。又復互相立約，條分縷晰，其有不便者，得以隨時酌更，似乎明恕而行，要之以信。可以邀如天之福，永輯干戈而共享昇平焉矣。然揆其情勢，則約可恃而不盡可恃也。蓋立約一事，本非有所甚愛而敦輯睦之誼也，亦非有所畏而聯國之歡也。不過勢均力敵，彼此無如之何。或意有所欲取，而姑以此款之，或計有所欲行，而先以此嘗之。若利無所得，則先不能守矣。故夫約之立也，己強人弱則不肯永守。己弱人強則不能終守。或彼此皆強，而其約不便於己，亦必不欲久守。即如黑海之約，各國俱所與聞，不獨英、俄也。英欲守之，而俄必欲背之，豈俄不畏諸國之議其後哉？誠以守此不渝，則擅其利者惟英，而受其敵者惟俄也。俄且日就富強，換島於日本，而水師有其備矣。取地於霍罕，而通商得其道矣。地兼三海，捲甲而趨，歐洲在其掌握。路關西疆，屯兵伺便，印度據其咽喉。故英之欲守約者，蓋藉此聯絡諸國以相援也。俄之欲背約者，蓋非此則難越雷池一步也。此不獨英與俄自知之，即天下萬國亦無不知之者也。⁸¹

中國明清兩代，宗藩封貢制度達於嚴密完善，彼此維繫中國中心關係，除敕賚與貢表之外，別無條約可循。然而五百年間，中國未嘗滅一藩屬。以越南為例，一八七四年法越條約，第一條列明承認越南為獨立自立之國。而十一年後，一八八五年法國併滅越南。以朝鮮為例，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第一條承認朝鮮為獨立自主之國，十五年後，一九一〇年朝鮮亡於日本。此等國際關係制度，已成大欺小強陵弱之工具，豈可不加深思反省。當據史實作一比較，端恃中外學者識見心術而予以正確評駁之。

附記：本文係在一九七八年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支助下得以順利完成。特此聲敘，並誌感謝。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日寫於香港中文大學

81 王韜著《弢園文錄外編》，卷五，第七頁。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 Summary)

Wang Erh-min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ormation in China of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other words, the way Sinocentricism yield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equality of all powers. It also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of relationship by China with her neighbouring states from ancient times till the modern period and its significance. The discussion falls under four heads:

First, the theory and institution of the maintena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a. Sinocentricism has its origin from the phrase 'China proper and the five outlying areas' (*wu fu* 五服) in the *Book of History*. This concept was essentially an ideal based on unity and harmony; it was not by itself a policy. But it was later held as a golden rule and became a basis upo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was built. As to the idea of the 'Middle Kingdom', it was developed from the feudalistic system of the Chou dynasty, which ha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the Ode 'the Northern Mountains' in the *Book of Poetry*. There it is stated that 'No land under heaven does not belong to the emperor, nor any people not his loyal subject.' And in the ancient work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 status and authority of Emperor Chou as the master of the people were constantly asserted. Through the promotion of Confucius, Mencius and Ssu-ma Chien, the idea of revering the 'Middle Kingdom' was deeply implanted in minds of the people. As this concept was upheld by emperors of all dynasties, it developed into one of a full-fledged tributary system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and it became realized in Sinocentricism an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iddle Kingdom and foreign countries during the last five hundred years.

Second, China's adapta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the impact from the West. Here we deal with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when China's 'Good Faith Diplomacy' was challenged by 'Power Diplomacy'. The Chinese people then began to move away fro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through its superiority in military weapons to contemporary diplomacy,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right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laws and treaty negotiation.



Third, a retrospect of the relations among stat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d the advocacy of vigilance of the Russians. As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ere confronted with a totally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they naturally fell back on antecedents in ancient times and tried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erms of the Warring states. From this, their sinocentric ideas gave way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quality of all powers, and they began to understand that the annexing of the weak and deceptive tactics in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 were actually no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Warring Period. By such analogism, they also realized that the Russians were forever after Chinese territory and hence there was a call for vigilance over the Russians.

Fourth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balance of power. Every Chinese, through an understanding of power politics, began to see the nature of Western intrusion and the hard facts of colonialism.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ed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principles underlying international intercourse among Western states, diplomacy, law, balance of power and alliance. They further considered the possibility of arbitration through an international body.

